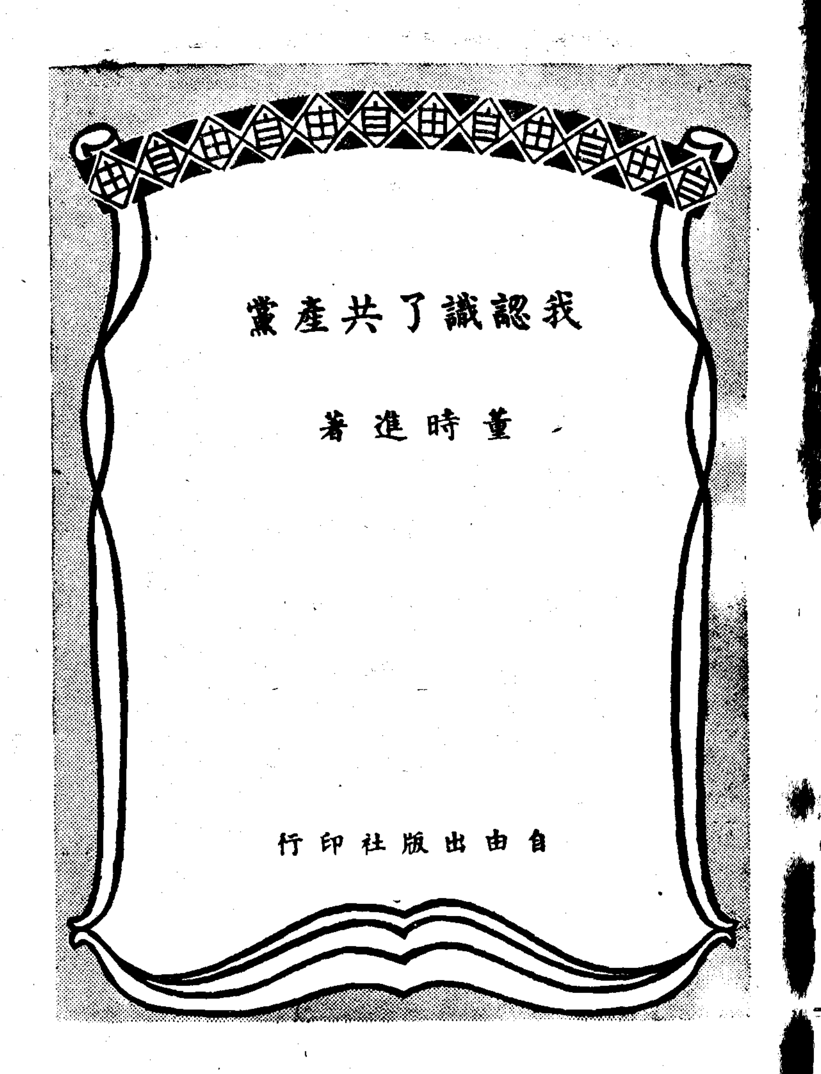


王時進 著





著者　董時進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九龍九龍城道三十一號地下
Published by Freedom Press
Kowloon, Hong—Kong

承印者　田風印刷廠
香港高士打道二二一號

總經售處：
福利書店
香港德輔道西二六九號
平安書店
九龍彌敦道六七六號

定價港幣一元

中華民國四十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五月再版

陳寒波先生遺著

序言

在過去，我對於共產黨一直是抱幾分疑懼，又抱幾分希望的，看見大局有難於挽回之勢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將疑懼排開，使希望抬頭。這可以說是犯了「如意想法」的毛病，我想，犯這種毛病的人一定很多，恐怕多到佔全國人民的大半。但是待我一步一步地和共產黨接近之時，並在他們的統治下生活漸久之後，我便發覺了他們完全不是如我所希望的，而倒是如我所疑懼的。這本書上所寫的，是我逐漸認識共產黨的經過。

我來到香港後，得悉曾經有幾家報刊登載過關於本人的傳說。有的說我徬徨無主，有的說我企圖靠攏，這都是不正確的。我從來沒有徬徨過，而且一直是有主的，我之所主即是民主。

至於說到「靠攏」，我可以很坦白地說：假使我實地考察的結果，發見中共的行爲是確合乎我的理想的，我一定願附驥尾。但若是要違背理想，去靠攏權勢，則我從來沒有作此打算。所有經過的事實，都在這本書上。

我本是要去買牛的，走去一看，才是一只老虎，我趕緊跑開了。我把我的經驗告訴出來，希望能幫助一些尚不認識這只老虎的人認識牠。

一九五〇年十月董時進序於香港

目錄

我認識了共產黨

農民黨與中共五一號召

我憧憬民主政治多年了，自從在美國讀了幾年書，受過一點民主風氣薰染之後，回到中國來，見到一些不合民主的事情，都感覺看不慣。在將近三十年以來，我的口裏和筆下，隨時有對政治不滿意的批評，都是由於這種關係。遠的不必說了，單說民國二十七年我在成都創辦了一個月刊，名叫「現代農民」，我的主要目的，便是爲了提高農民的智識程度，幫助實現眞正的民主。嗣後這一個月刊社發展到中國農業協進社及中國農業協會，最後並產生了一個中國農民黨，其一貫的宗旨，都是爲的求中國的民主。

除了民主而外，農民黨還有一個目的，即是和平。在我們的政綱的總則上，第一點卽是，「根本消除內戰」，第二點是「實現眞正民主」。民國卅七年五月修正的政綱。除了將總則上的「

消除內戰」一語擴大爲「消除一切戰爭」（因爲彼時本黨已與國際農民組織有聯絡。）而外，其第一條便是，「實行民主政治，反對一切極權政治」。

農民黨（和我自已）成立以來的一切言論和行動，主要的都是依據這和平與民主兩項目標進行的。爲着實現和平，我曾經在滬渝大公報上發表過一篇「向共產黨進一個忠告」，勸他們放棄武力，以民主國家政黨的方式從事政治活動。我曾經聯絡過幾百位朋友公開地向國共雙方呼籲停戰。農民黨也曾經向國民政府和國民參政會力促和平，曾經促請美國駐華大使出頭斡旋和平，也曾經向毛澤東呼籲過和平。到了民國三十八年歲首的緊急關頭，我們還特地到了南京，勸國民政府立即開始和談。

在民國三十七年的夏天，我們得到了一個消息說，中共在五月一日曾經發出了一個號召，主張邀集各民主黨派及團體等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我們認爲這是一綫和平的曙光（後來才發覺並不是的），於是於七月廿一日發表了一篇公開響應的宣言。（該宣言曾刊登於「現代農民」第十一卷第八期，民國三十七年八月。）那篇宣言的動機和精神完全是在和平及民主兩點，其中有幾句話是：「八年抗戰之後，內戰接踵而起，連綿迄今，將滿三年。戰區日益擴大，人民痛苦日深，尤以農民被拉上戰場，直接供砲火之犧牲，情狀最爲悲慘。……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忽發出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文告…………凡願意戰事及早結束，及以和平方法解決國事之人民，當無不樂聞此項消息。」關於民主一層，該宣言中還有以下的一段話：「吾人願藉此機會向中共進一忠告：一般人多謂共產黨爲專制性質之政黨，因而頗多懷疑中共民主的號召。此次中共既鄭重表示，願聯合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希望將來正式開會之時，能顧到實際社會環境，儘量容納各種不同之意見及主張，勿堅持已黨之成見，方可以順利的達到眞正和平統一之目的。」

由這一個宣言可以看見，雖然共產黨是以民主爲號召的，但是我們對於他們是否當眞實行民主，仍舊有一些不放心的地方，所以特爲提出一個忠告。

在那篇宣言裏面，我們對於新政協的組成分子和組成方法，會經提出了左列的四項意見：

「一、新政協必非舊政協之重開，而將改變其組織，擴大其範圍，對於農人及農業團體尤須儘量包羅，務期能反映全國多數人民之公意。

二、所謂民主黨派，殊難下確定之界說，現時之一切政黨，殆無不以民主二字爲號召，以故決定應否准許參加之黨派時，必須有超然公允之方法，並力求包容各方面，與其失之狹隘，毋寧比較寬大，即使有不合條件之黨派，亦可允許其中開明份子參加。

三、人民團體數目，不可勝計，品類亦極複雜，參加政治協商，不能漫無限制，必須以聲譽素著，對國家人民或學術有供獻者爲限。

四、無黨無派之社會賢達，尤難確定標準。按現代民主政黨政治之常例，凡參加政治活動，大都必須加入某個政黨，無黨無派者參加政治乃居絕少之例外。而且此類人物，即使未正式加入政黨，實際亦多與政黨有關係，以故吾人主張，社會賢達之參加，應由黨派提名推薦，各黨派推薦之人數，應有一定之比額，方不致漫無標準，惹起紛爭。」

我們雖發表了這一篇宣言，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主張和他們的頗有距離，我們尤其知道，我們的土地政策和他們的，相差更遠。不過我們聽說（只是聽說，無法得知眞相），共產黨是很虛心的，他們的政策不斷在修改中，他們的態度是很寬宏的。我們雖不放心，却不能不願意和他們有直接接觸的的機會，以便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讓他們也多知道我們的主張。

後來在北平召開的「人民政協」，與我們所提的幾項意見迥不相同，這固不是我們當時所能預料的。

訪問香港及北上

同年九月我們接到香港友人來信叫本黨派人赴港，與中共方面人士晤談。十月梢本人前往，得與中共駐港負責人潘連二君一度談話。他們告我說，曾見到本黨宣言，其內容與他們的意思，尚有出入。（直到我赴平以後才明白這出入很大，當時我們對中共太欠認識，是不用諱言的。）他們並透露，曾將本黨的問題提出各黨派坐談會討論過，有對本黨不甚同情者。不過他們又說，他們對於已經過去的事情，概不追問。意思是，只要我們今後願和他們一起，他們是不會拒絕我們的。我告訴他們，我們的土地政策，和他們的有一些差別，但這並不是什麼立場的關係，乃是彼此對於中國土地問題和農村問題的了解不同，希望他們對於我們的意見能够虛心接納。關於這一層，他們沒有表示意見。他們又告訴我，黨是一個從事政治鬥爭的團體，他們認爲我們的鬥爭工作太不够。

我們的談話，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我此行的目的亦只是爲作一個初步的接洽，先認識認識，而不是要馬上求得什麼具體結果，因爲我們互相了解還太淺，決不是短短的一度晤談便能作

什麼決定的。我們住在內地，對於中共的政策和行動，一直得不到直接的正確的認識，所聽所聞的，有說他們是如何殘暴專制，有說他們是民主自由，有說他們的政策是始終堅持不變，有說是已經改變了很多。總括當時我們的印像，大致是相信在各地鄉間打人殺人一類的事體是土共幹的，至於上層人員則比較開明，虛心，寬大。我們相信他們是愛國的，溫和的，民主的，能容納各階級合作的。我們並曾聽說，他們已經停止了沒收及平分土地的辦法，並要保護和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但是我們始終得不到直接的，確實可靠的證明，心裏總是有一些朦昧。我們希望去香港之後，可以看見各種中共的書報，可以直接與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多接觸，因而可以逐漸地得到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是這一次我在港一共只住了三天，和中共方面接觸只有一次，自然所知所聞仍很有限。當時曾經有數位朋友勸我將農民黨總部遷移到香港，叫我自己也搬家到香港去居住，但是這個我始終沒有辦到。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初，戰局急轉直下，北平已落入共軍之手。那時候我已回到重慶，由南京上海的農業機關及朋友索取了一些綠肥作物的種籽，殺虫藥劑，洋鷄蛋及雜交玉米種籽等物隨身帶回去，準備至少以一年或大半年的時間，專心去發展我的農場。不料一個月還不到，事情又迫使我放下我已經開始了的計劃。

我接到由上海轉來的北平的農民黨員的函電叫我快去北平，說他們已見到了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的若干重要人物，主張叫我去，以表示精誠合作；又說新政協代表人選及日期等均尚未決定，農民黨有希望參加；又說由香港去天津航運暢通，可以自行買票前往。此時我的農場工作恰正開始，當然很不願意丟開。我寄了一封航空信去北平，詢問詳細情形，包括中共的確實的政策和作風，以及人民對他們的反應等等，打算等回信到後再決定去否。（事後我知道那封信在我已到北平後一二十天才寄到）恰好在這時候，（四月初，即大西洋公約成立之時）各民主黨派聯合發出了一篇對外宣言說，假使美國要和蘇聯衝突，中國一定站在蘇聯的一邊作戰。這宣言不由得使我看了發悶，因爲我們一直是主張和平的，不願中國捲入第三次大戰的漩渦，尤其不願和蘇聯一邊去打美國。現在各黨派既明白表示袒護甲方，敵對乙方，無異是已經預約參加第三次大戰，甚至可能促進第三次大戰。當時我就寫信告訴本黨在南京的一位負責人說明這種意思，並說北上的計劃須得從長考慮。但是京滬的朋友接連函電催我就道，說時機迫促，不可一誤再誤，關於第三次大戰的事情，更屬過慮云云。我感覺我對於團體的責任很大，不庸推諉，無論成功失敗，必須得走一趟。假使不去，大家必然將一切責任都歸咎於我的不去之上。於是我沒有等到北平方面再回信，，於四月下旬就買了儘早的飛機票去香港，同時並邀了武漢本黨的兩位同人到港會集，一同

北上。待我們抵達香港後，得悉香港的各黨派領袖，大多已經北上，中共原駐港負責人員也不在該處。我們不會去找任何人，就自己買好船票去天津。本想先打電報去北平通知，也因無法拍發而作罷。

幾乎作了階下囚

我們坐了十天船才到天津，一上岸就遇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這只好說是由於我自己對於中共太欠認識的緣故。碼頭上檢査很嚴，最認眞的倒不是査私貨或金銀外幣等物，而是査文章書刊筆記之類。我隨身帶得有一些稿件，剪報，筆記本和雜誌報紙上的文章摘要之類，捲成一包擺在箱子內的上面。檢査員把箱子一打開，首先就取出這包東西，如獲至寶似的，仔細的翻看。他翻開一本小筆記簿，專心閱讀，一邊讀，一邊瞅我，費了很久的時間還不肯放手。我告訴了他，那些東西是什麼性質和什麼用途，並告訴他，我是幹什麼的，同中共中央什麼人認識。他似乎聽不見我的話，也不答應我，只是潛心的讀，依舊一邊讀一邊用偵査的眼光瞅我，好像是獲得了什麼重大嫌疑的證據的神氣。他吩咐我等一等，他另外去找來了一位大致比他的權力較大的政治人員，對他說了一些話，把我的東西交給他了。過了一會兒，他叫我同他到旁邊的檢査室裏面去（一直是在露天檢査，太陽相當强烈）。他坐下慢慢的翻閱，一邊翻，一邊盤問我。他挑出了幾件特別重要的東西，一是國民黨蔣總裁四月廿七日由溪口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上面附有蔣氏的照片，

是由香港星島日報剪下來的。一個是一本雜誌上的一篇關於土地問題的論文摘要，還有一件是筆記本上的兩小段話語，其中一段說：「中共說美國是帝國主義，殊欠允當。美國實在不是。美國決無侵略他國的意思。說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是可以的。但是美國與俄國作了對頭，却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美國人看蘇聯是極權政治，蘇聯要想伸張其勢力範圍，美國人加以阻止，所以美蘇成了對頭。」另外一段說：「國共兩黨的爭執，主要的並不是為主義或思想。這次中共提出的和平八條，只有土地改革一條，近似主義的性質，然而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條件。在上次政協，根本連這一條也沒有提出。會議的破裂也決不是為這些，而是為的軍隊和政權等等關係。」

我寫筆記，常常是在車上或船上，或在路上行走時，想起什麼寫什麼，有時候是看見什麼，或聽見什麼就寫什麼，多半是匆匆忙忙，並不會去多用心思，連字句也不暇去整理，寫下也就忘記了。我的意思是，姑且記下來，到將來有閑暇時翻翻，或許有一部分可以利用的。但是我有時翻閱以前的筆記，常常發現有好多自己也看不懂的，或者是顯然謬誤的。譬如上面談到國共之爭不是為主義思想的一段。自我在共黨統治下住了一些時候下來，我已經明白那段話不對了。然而想不到，這次竟為這樣馬虎不經心的筆記惹出了一樁禍事。

另外還有一些零星稿件和碎紙片上寫的筆記等，裏面有批評政治的，有記述鄉間疾苦或黑暗的，也有各種各類的感想和記事。其中有一些是各方面投寄給現代農民的稿子，行前匆匆忙忙收撿起來隨身帶着，是預備有空時慢慢地挑選和整編的。可以用的就付印，不可以用的再扔進字紙簍。但是那檢查員都一一詳細地翻看過了，並且挑選了一些出來，問我帶起這些東西走是什麼意思，並且說我的思想不純正。

那位檢查員特別强調指摘我的筆記本上的「美國不是帝國主義者」的話，他說：「美國還不是帝國主義者麼？它的飛機在中國領空上滿天飛，兵艦不但停泊在中國的領海，而且進入了內河。這簡直是把中國當殖民地，還不是帝國主義是什麼？」我說：「美國的飛機和軍艦都是國民政府請來的，並不是美國派來侵略中國的。」他帶着忿怒的神情道：「那是賣國政府，乃是美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我不便同他辯論下去了。到現在蘇聯的飛機却又在中國的領空滿天飛了，蘇聯的軍事人員和顧問也散滿在中國的境內，不知道他們何以不說蘇聯是帝國主義者。

這兩位檢查員一位是穿的草黃色制服，一位是穿的灰布「解放裝」，戴的灰布「解放帽」。這是我看見全付「解放裝」的共產黨的第一次。他們的面貌都是很陰森，很嚴肅的，眼看去感覺得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非常之遠，精神上不能溝通，也無法互相了解。大約他們都是老黨員，是

多年在共區裏面成長出來的。他們和共區以外的環境以及精神生活，一定都是很隔膜。特別是那位穿灰布「解放裝」的，一個矮小的個子，一付尖瘦的面孔，他的神情和舉動都和我平時所見的一些人很不相同。我想他大概是一位政治工作人員，對於黨的主義和精神的訓練必定有很深的造詣。老實說，我看見他不由得使我有一些害怕。

他們費了很長的時間，把我的東西大體上看完畢了之後，還是叫我等着。一直等到他們把所有的旅客都檢查完畢了，（大約不下三四個鐘點）一個檢查員纔說要我同他去。他把我帶到了公安局，將我安置在一個候審的房間裏面，叫我等着。他攜了我的筆記等件出去了。那房間裏面有三四個不知是犯人或是犯人的家屬，其中有一個女的在那裏哭哭啼啼地不知是乞訴什麼。另外還有一個和我同船的，在身上搜查出了一張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證，也和我一同帶進了公安局。也許是他的情節較爲重大，是被收押在遙遠的一間樓上，我看出他的臉上發靑，現出非常恐怖的樣子。

過了約有大半個鐘點，那位檢查員囘來了，他帶我走進一個辦公室，見到了一位高級職員，大約是局長或副局長，我並未細問。這位職員一眼看去知道他是一位有較高的智識的，年齡也大一些，我感覺我可以和他講得通道理了。我將我的情形和來歷告訴了他，他到底是一個比較明白

的人，立即向那檢查員，一語道破說：「決不會是特務，幹特務的決不會帶着這些東西走路。交給科裏辦好了。」他找了一位科長來，科長又引我到他的房間去談了一會兒，問了我不多幾句話之後，他便走出去了。大約過了半小時他又囘到房裏來，將東西發還給我，問我住什麼地方，並說所給我的一點兒不方便，請我原諒。他要叫吉普車送我，恰好司機找不着，我也推辭了。他吩咐一位警士替我喊了一輛三輪車，並幫我講好了價錢。臨走時，那警士吩咐三輪車夫道：「價錢講好了，走攏不准瞎來啊，這是咱們自已的人。」他不知道我是一個嫌疑犯，他只看見一位科長送我出來，便以爲我是他們的客人。

與我同行的還有兩位朋友，他們兩人已經先去找好了旅館。我囘到旅館之時，他們正在那裏着急，他們告訴我，假使我再不囘去，他們就準備打電去北平，或先去一人到北平向中共當局交涉了。我正在和他們談起我去公安局的經過時，突然店夥二進來報告，有一位同志來會董先生，跟着在後面的便是一位穿灰色制服戴灰色帽的中共同志，這又不免使我們驚詫了一下。

這位「同志」帶着滿面笑容走進屋來，與我拉一下手說，他是市政府交際處派來的，因爲他們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到了天津，住在此處，特地派他來接我到招待所去住。這時我已經是非常之疲倦，又渴又餓，只想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去北平，而且行李又不少，所以很不願意搬動。

我竭力辭謝，並請他同去謝謝交際處處長。但是這位使者，態度非常堅決，非常懇勤，非完成他的使命不可。我再三固辭不獲只好答應他，請他允許我休息一下再去。

我叫一碗麵吃了，又躺了一會兒，把行李重新收拾好了。交際處的那位使者喊了兩步汽車來將我們三個連人帶行李一起接到招待所。那招待所是一座很華麗的洋房，招待非常週到，非常客氣。晚上還要請我們去參加一個娛樂晚會，我們因爲要另看朋友未去。次日晨，招待所預先給我們買好了去北平的火車票，派汽車把我們送上火車，一切替我們安排妥帖，交際員才回去了。

我們在天津的時間很短暫，會見的人也很少，所以對「解放」後的天津不能有什麼深的認識，只感覺街上還呈現着戰後的景象，市面的繁榮還沒有完全恢復，來往的行人不太多，穿着都很樸素。所會見的一兩位朋友都一致稱讚中共人員的廉潔樸實，和辦事認眞的精神，並說他們的作風很溫和，沒有搞淸算鬥爭，對於私人財產和企業一概保護。這些都是使我們很欣慰的。在那時初到共黨統治區，不免有一些好奇心理，我很留意觀察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到底起了什麼重大的變化，他們在物質上或精神上有何與以前不同之處。他們變成了統治階級，也許很驕傲了，自大了，他們或許敲起竹槓來很厲害，使你再不敢和他們抗辯。但也許他們都是很規矩，很講理，完全不敲竹槓了。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免模糊的存在我腦子裏面。因此當我們在輪船碼頭要出門的時

候所看見的一些現象，就使我的幻想消散了不少。碼頭外邊的馬路上停了一些三輪車和搬行李的苦力，在那裏亂哄哄的叫嚷得非常厲害。兩三個警察把守着木柵門，都抵擋不住要擠進來搶拿行李的車夫苦力。好幾次大門被擠開了，他們費了大力氣又才關起來。每一個旅客走出門，都被好幾個車夫苦力攔住，要拉他的生意，搶他的行李，使他手忙脚亂寸步難行。我看了這種情形，簡直害怕出門。好在我有一個穿黃制服的檢查員同我一路，他走前，我跟着他，但是仍然不能阻止那些車夫苦力的蜂湧前來。檢查員也着急了，正顏厲色的訓斥了他們一頓說：「這成什麼樣子！現在是咱們無產階級自己的政府呀！咱們都是國家的主人翁，像你們這樣亂擠亂搶豈不丟人嗎？」那些車夫苦力，靜了一下子，帶一種半畏懼，半奇怪的表情，望着檢查員一會兒。但是話一講完，檢查員一舉步，大家又湧上前來搶我的行李了。我問檢查員去公安局約需車資幾何，他不肯說，只叫我自己和他們講。車夫說不必講價，我想現在多半有規定，不致胡要的，何況是到公安局。到後才知並無標準，他們需索很多，我略爲減少二三成把了，他們也並未十分爭執。事後知道那次所給的車價比平時雇車的十倍價錢還多。這本沒有什麼可以驚奇的，可驚奇的是我自己的幻想。無產階級如此窮，智識如此低，人又如此多，要改變他們的習慣，提高他們的智識程度和生活水準，本來不是一個政治革命就可以做到的。

在天津這一塲遭遇，使我非常懊惱。我怪我自己太大意，咎有應得，但同時我也不能不對於共產黨起了戒心。原來共產黨對於剪下來的舊報紙，未刊印的稿件，和私人的筆記，都是要管制的啊！這還有什麼自由，還說什麼民主呢？不過我卒被釋放了，可見所聽聞的「上級人員較爲開明」的話，也是不錯的。雖然如此，我從今以後卻不得不隨時小心謹愼了。

在北平的活動

我們到北平的主要使命是要爲農民黨爭取參加新政協。我們要求參加新政協的基本態度，和以前農業協會要求參加舊政協的態度是一樣的，即是我們認爲我們代表農業界，代表國家主人翁的重要部分，對於一個商討國家政治的會議，我們理應參加，不能放棄自己的權利。不過在這裡我要指明，農民黨還並未曾正式決定要參加新政協。本黨最近一次的中全會關於這事情的議決案是：「本黨今後應與國內及香港等處民主人士取得密切聯絡，對於政府及中共雙方均保持中立。是否參加新政協，授權中常會屆時視各方面情勢斟酌處理」。嗣後中常會屢次擬派人赴香港及北上，也都是僅僅談到與各黨派聯絡，及考察共區施政情形，報告總部，從未說過要派代表出席新政協的話。不過政黨本來是要搞政治的，眼看到舊的政府快垮台，新的將成立，爲什麼不希望去取得一個地位呢？所以多數同人的意思是：只要原則和政策上沒有重大的衝突，決不能放棄參加新政協的機會。這即是說，假使北上接洽圓滿，而考察中共的作風和政策也適合我們的意思，則只要報告回來，主張參加新政協，中常會一定是可以通過的。但是，假使中共的政策和作風，與

本黨距離太遠，則我們寧可不參加。

在我動身之前，本黨另外還派有一人北上，他約先我們半個月抵平，已經與各方面人士見過面。我們一到之後就得悉中共對於農民黨及我個人都尙欠了解，例如說我們的工作表現不够，我們的立塲和態度都多少還有一些問題。他說，前途困難頗多，不過希望還是有，但必須得對以往的事體加以解釋，今後尤要改變作風，努力表現親共的態度。他告訴我，中共統戰部曾經選了我的若干篇文章印成一冊「董時進先生言論集」，分發給各黨派人士研究。他認爲這是還有希望的徵象，因爲假使大家看過那些文章之後，認爲我的態度和言論，與他們尙屬一致，則本黨就可能獲得通過。他又告訴我，他已經代本黨做了不少的工作，以黨的名義發過了好幾篇擁護中共和慶祝解放軍勝利的宣言，並自行擬訂和油印了一套極左傾的黨綱和工作計劃以代替原有的政綱，送到統戰部去了。我聽見了這一項消息，心裡頗感不安。我覺得他犯了造假作弊的毛病，不過他是出於爲團體求諒解的一番熱忱和苦心，我不能不加以原諒。我認爲我們的態度是如何，就是如何，應該把眞實的情形讓他們知道。過去的言論作爲，不論對與不對，够或不够，都是無法改變及補救的。他們認爲可以容納固好，認爲不可以容納，也不好勉强。不過我們既然不惜花費，不辭辛苦，遠道前來，自然是誠心誠意，潔己以進，一定是願意虛心學習的。只要我們發覺自己的錯

誤，一定要毅然改造自己，只要看見他們的好處，一定也要欣然接受。但是，假使只爲着求容納，求參加新政協或新政府，便一味捨己從人，昧着良心去逢迎取悅，那便是虛僞，虛僞是我平生所最痛恨的，我決不能够那樣幹。

我們幾個人商討之後，決定了兩項事體要積極去做的。一是努力學習，一是表明成績和態度。爲着學習，我們購買了好幾種關於馬列主義及中共政策的書籍來開始閱讀，並隨時向老解放區來人討敎。爲了表明成績和態度，我們決定將過去一兩年的作爲，如所發表的宣言和文章以及其他奔走聯絡，招待新聞記者等活動，儘量陳述給中共負責人，使他們知道我們已往的成績。此外我們又決定，今後凡遇着解放軍的重大勝利，或其他適當的機會，如紀念日等，我們也仿傚其他黨派的辦法，向中共祝賀。關於這後一項的活動，恰好很快就有一個機會到來了，那即是武漢的解放。我們抓着這個機會，決定發一個賀電，由我們中間來得最早的一位朋友擬了一個電稿，因爲他比較上明瞭解放區所習用詞句、筆調、和稱呼等，經我稍加删改之後就發出了。孰知這電稿寄到各報館之後，竟沒有一個報紙刊登出來，這使我們明瞭了新聞管制的嚴密。自此以後，我們也就不願再發此類的電稿了。

說起我們過去的成績，我們不能不有些慚愧，即使想來一個丑表功，然而可表的也實在太少

。我們既不能揑造事實，說來說去，也出不了什麼抨擊貪汚，呼籲和平，揭發農村黑暗，反對徵兵徵實等幾項老調。這些老調，無論如何誇大，總比不上實際的地下工作。何況我們攻擊國民黨政府的時候，主要目的是在促它的改進，而不是要促它的顚覆。

學習及坦白

關於學習一層，我們不僅是極其虛心，而且可以說是一心一意想學會學好。因爲很明顯的，在那種新的局面之下，假使能將思想澈底「搞通」，能辦到眞誠明瞭及信仰共產黨的主義和政策，於自己乃是很有利的。反之，假使搞不通，不能眞誠信仰，而且又不能掩蓋着自己的不信仰，則顯然是於本黨前途有妨害的。但是，如上面所說，我的脾氣是憎惡虛僞的，我又不會掩蓋和裝作，因而我遇到利害關係與信仰衝突時，只好犧牲利益。這大致也是我們此次未能圓滿的完成使命的一重要原因吧。

我一到北平，先我而到的那位朋友，首先就對我說及某某等民主人士北上後「坦白」的經過。據說，他們到了北平，因爲中共方面對他們不能完全了解，他們都發表文章坦白過，然後才得到中共的信任。他的意思是叫我也考慮這一層。他又告訴我，統戰部某君曾與他屢次談到這些事體，他認爲是向他暗示，希望我也來一次坦白。確實，嗣後中共與我們取聯繫的朋友同我談話時，也提起過某某如何坦白等等。因此，農民黨的幾位同人都認爲這大概是一種暗示，所以也勸我

考慮這坦白的問題。大家爲黨的成功心切，以故不惜盡力去消除一切障礙和誤會，以求達到目的，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在我自己當然不願拂逆他們的意思，而且很願意竭盡一切去使我們此行的使命成功。所以我決定，只要發覺了我的錯誤，我一定不文過，不護短。但是我亦不能放棄自己良心上所認爲正當的主張、假情假意的譴責自己，和奉承其他不同或相反的主張、政策、制度、或主義。

我告訴我自己，我過去是住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對於共產黨的行爲，不但不認識，而且所聽所聞都可能是片面的反宣傳，不能代表眞相。所以必定要虛心學習，摔掉以前的「包袱」，不要讓任何成見妨礙我，而要以客觀的態度，求眞理的精神去重新排頭。我儘量抽出時間去讀前進的書籍，雖然有的讀起來感覺很不好懂的，也竭力去求懂得。每天的報紙，儘量的仔細看，過去一兩個月的舊報也找來看，特別用心去讀社論，問題解答，和學習心得等，意在看看人家是如何學習和轉變過來的，以便給我一些啓發和指示。我也逐處留心觀察各方面表現的實在情形，並探聽各種人的意見，包括車夫、攤販、店夥、農人、智識分子等等，而加以分析。我學習和觀察的結果，感覺有許多的事體及辦法是好的，新鮮的，但也有一些事體及辦法是我所認爲不對的，不應當的。我慢慢發覺，令我佩服的是顯露出來的一些措施和作風，而隱伏着和比較上不大顯露，因

而不大容易看出來的基本政策，和精神態度，則多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我觀察和學習的時間越久，令我懷疑的地方越多。這是一樁令我失望，令我懊惱，令我恐怖，而又無可如何的事體。我發覺一些書刊多屬文句艱澀，而內容則概是教條式的，武斷的，矛盾的，所述的理論也往往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我又聽到過好幾位中共要員的演講，反使我感覺到他們的理論的牽强，偏歪，主觀，而與他們所講的客觀，求眞理的精神，恰正相反。因此，我覺得越來越無法「坦白」了。直到離開北平，我始終還是沒有「坦白」過。

逐漸了解眞相

不去研究還好，越研究，越觀察，越覺彼此之間的鴻溝寬濶。我發覺我和他們的主張和見解眞正相同的很少。即以對於國民政府的態度而言，他們所反對的是說國民黨政府是一個代表地主買辦資本家的反動政府，我們所反對的却是它的腐敗、貪污和不够民主。又對於中共所號召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和反官僚資本主義，所謂三反政策，在未明白眞實的內容時，我是覺得沒有不贊成的理由的。但是在逐漸地知道眞實內容之後，我却不能不有所保留了。帝國主義本來是應當反對和打倒的，但是他們的所謂帝國主義者，却並非我們的所謂帝國主義者，乃是指的反共的國家，實際上就是美國。這是與從來各國對待中國的事實不相符合，而且與我們的認識大相徑庭的。所謂封建，我們認爲應該是指一些割據的軍閥和把持政權，橫行覇道，倚勢凌人的官僚之類，而他們才是以所謂地主者爲對象，將鄉間有一點田地的普通人家都算爲封建。這些見解都是我無法附和的。我們逐漸地看出而且體驗到了言論統制的嚴密，和集會結社的不自由。我們想恢復一個刊物，很久得不到允許，想召集一個會議，不但不能獲批准，甚至口頭邀約時，朋友們都

表示不敢出席。我看見了到處掛着和舉着的史大林和中共領袖們的畫像，以及「萬歲」的標語，都使我心中納悶。這豈不是帝制和封建式的作風嗎？豈不是我向來很討厭的嗎？在國民政府時代我不是曾經時常批評過這一類的事體嗎？在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的現代農民第七卷第三期，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請政府禁呼萬歲」，那裏面有下面的一些話：

「萬歲二字原係在專制君主時代對於皇帝的稱呼，自入民國，本應與皇帝二字同時停用，但事實竟不然。近些年來，可用得很普遍，上自大官，下至鄉鎮長，都有人呼萬歲。在這民治高潮甚囂塵上的今日，此種開倒車的諂媚稱呼，實在有嚴厲禁止的必要。

「民主與君主絕對不同，民國的首領，無論是總統或主席都有一定的任期。至於一個地方的長官更不用說，那裏安得上萬歲二字。如果說此二字不妨借用，那末，皇帝、王侯、陛下、朝賀、詔書等字，也不妨借用了。這顯然是不可以的。

「假使萬歲二字尙有可以應用的地方，也只有用之於中華民國。此外對於任何人，以及任何團體機關，都是用不得的。這雖是民治的形式，也有關民主的精神。願政府通令禁止再用此一稱呼，違者以背叛民國論。」

又在該刊第七卷第八期，有一篇短評，題目是「共產黨的作風」，裏面是根據中外新聞

記者團赴西北共區考察的筆記，所下的二段評語。除其中一段是推崇他們的「三三制」（即是在從事政治的人員當中，共產黨員只許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必須爲黨外人士。假使共產黨員佔了三分之一以上，必須使超過的人數辭職，另以非共產黨員補充。）而外，另一段則是批評他們的另一種作風的。該段說：

「在共產黨區域又可以看得見到處掛起共黨領袖人物的照片，貼起擁護推崇的標語，甚至於教科書上也編入讚美的課程。這種崇拜偶像，以個人爲中心的人治主義，是與民主精神相背馳的。共黨既以民主爲號召，似不應有此作風，同時凡誠意要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各黨各派也都宜以此爲戒。」

由這幾段話可以看出我的態度，現在我親眼見到了這一些我不喜歡的現象，而且看見他們搞得很起勁，聽見他們喊得很響亮，我心裏不由得要問：「共產黨喊了多年的民主民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將來究竟會是一個什麼局面？」

另外還有一件使我感覺不安而且驚詫的事件：當我翻閱過去幾個月的舊報的時候，我發見滿紙上極共濃厚的火藥氣味。在和談期間，共產黨不是一直在斥責國民黨沒有和平的誠意嗎？我們不也是曾經奔走呼籲，甚至於主張國民黨政府應不惜任何代價以謀致和平嗎？現在一翻看和談時

期的共區舊報紙，纔都是充滿了鼓吹迅速渡江，澈底消滅敵人的言論，和緊急準備戰事的消息，情緒激昂，達於極點。這不僅使人不相信中共的和平誠意，而且令人對於他們說話的眞實性也發生了疑惑。

事情逐漸明朗化

我本是一個不喜活動，不善活動的人，到了北平之後，要去拜訪這位民主人士，那位中共人物，我已經感覺有一些爲難了。然而因爲受了團體的委託，責任所在，不得不硬着頭皮去碰。但是，自從我接觸到了上面所說的一些不合理，不民主的事情之後，我的懷疑一天增加一天，我的勇氣也一天減少一天。我越來越不愛活動了，不但不歡喜出去找人，即使遇見了所要找的人，我也不願意談起目前的政治問題了。所謂前進的書籍，我不歡喜看了，起初幾天看來滿新鮮的日報，慢慢地也感覺沒有多大意味了。於是我找到了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還是看看讀者文摘，和農場雜誌之類吧。在讀者文摘裏面，我看見了好幾篇描寫鐵幕內情的文章和書評，我覺得都說得很眞切，而且是與我所見到和遇到的事體很相近似的。我倒歡喜看這一類的文章了，甚至於專門尋找這些文章和書籍看，不過實際上這類的書刊是不可多得的。我曾經在一個人家看見了一本描寫共產黨在東歐某國操縱政治和迫害人民的英文書，由於怕危險的緣故，我不能將那本書借出門，只能去那人家裏面閱讀。我一連去了好幾天才看完了，這使我對於共產黨發生了很大的恐怖。

這時候我已經起了不參加中共政治的念頭，並開始考慮以後謀生的途徑。我遇見了幾位大學教授，聽見他們談起敎遺傳學必須根本改變內容，而且大家都不敢担任，因此我也知道我今後是不能去學校敎書的。我的主意是要在農業生產方面找出路，所以我在美國圖書館裡面留意找新的農業書刊閱覽，特別喜歡關於土壤保肥，和養蜂養豬養鷄等著作。自從我取得了借書回家的權利之後，我就更少於出門了。有一天我照常去還書並打算借新書的時候，一走到圖書館的大門，看見門首擺了一張枱子，有兩三個女職員守着，使我很詫異。她們說，借書證要收回，不能再借出去了。我問是什麼緣故，她們指我看門口立着的一塊告白。一看原來是奉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命令，禁止該館陳列，展覽，分發和借閱一切書報圖片等等。這個並不使我過分驚奇，因爲，該圖書館裏面，雖已找不出眞正反共的書刊，陳列備覽，然而究不免有一些爲共產黨所不歡喜的東西。共產黨的這一舉動，不僅打斷了我的一種消遣和求知的道路，而且也使我對於它的政策及作風，更增加了一點認識。

再回到我們北來的主要使命的本題，那即是爭取參加新政協的事體（假使考察後認爲滿意的話）。我對於這事件的態度早已打算聽其自然，那即是說，假使他們要我們參加，我們不妨從長考慮，假使不成，我決不再作任何努力了。這決定誰可以參加新政協的機關，在形式和名目上是

各民主黨派的聯席會議，但是我們很快就獲悉了，眞正具有決定的權力的，只有中共。我們得到消息，中共將派一位「大員」和我談話，我們只好靜候那位大員的明確表示。在和那位大員見面以前，另外有一位在統戰部負相當重要責任的先生，曾經和我們談起農民黨的問題。他的話雖很委婉含蓄，却也已經明顯的透露出來：本黨過去的態度不够積極，不够鮮明，我們所走的是中間路綫，我們的言論和主張也和他們的不盡一致。這一次的談話，並沒有使我感覺驚詫，因爲在那一天之前，我已經從一位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民主人士得到了類似的消息。他告訴我：中共是建築在農民身上的政黨，革命成功完全是倚靠農民，假使他們再承認一個農民黨，豈不是等於不承認自己可以代表農民麼？

我們從幾方面聽到差不多一致的話語說：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恐不易辦到，但是某某個人以專家資格出席，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一位早年相識的中共黨員一天告訴和我一同去北平的朋友說：他們裏面認爲中共即是農民的政黨，中共已經領導農民革命了，農民黨又要革誰人的命呢？豈不是要革共產黨的命嗎？他又說出，今後一切政黨的活動都是要受限制的，多數的政黨不久都是要被合併和取消的。所以他勸我們不如趁早結束黨務，專門幹技術的工作，這乃是今後國家所最需要的。我們認爲這一個忠告，是值得加以考慮的。

最後的談判

自從我們聽到中共要派一位要員和我談話的消息之後，過了十幾天，我才得到中共招待所的電話，約我和統戰部的羅曼部長在北京飯店一談。我過去和羅曼部長不認識，也不知道他即是李維漢先生，羅曼乃是他的別名。當我被引進他的會客室時，他以嚴肅的態度迎接了我，緊張的空氣，自然要多少增加一點談話的困難。我簡單的把我們的來意陳述了一下，便要求他給我一個明白的答覆。

他表示，他認爲農民黨沒有發展的隙地。他說，假使我們要走眞正的農民的路綫，那末農民會加入共產黨，不會加入農民黨。假使我們要走地主的路綫，那末農民又會反對我們。他强調今後生產建設工作的重要，勸我們多拿技術來貢獻給人民。他又說，他們曾經商討過我們的問題，研究過我們的文件，認爲我們參加政協難獲通過。他坦白的說，不論別的黨派怎樣，在中共方面他本人就不贊成農民黨參加。他說我的言論對於中共不够友好，曾經說過共產黨是專制的，不給人民自由的。這些話使我詫異，因爲我的意識中所能記憶的是，我批評國民政府的言論雖不少，

却從來沒有攻擊過共產黨。因爲我根本還沒有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雖隨時會聽到一些關於共黨暴行的傳說，然而都當它是土共所爲，未曾放在心上。並且我對於所聽到的關於共黨如何改變作風，糾正偏向，禁止打殺，提倡生產，保護工商，以及願意與列强互惠通商，不加仇視等等政策，都是深信不疑的。李氏告訴我，那些話是在關於解散民盟的一篇文章裏面所說的。這更使我奇怪，因爲那篇文章原是批評國民政府而爲民盟辯護的，民盟是中共的友黨，何至於爲民盟辯護，反而批評起中共來呢？我要求他拿原文給我看，果然在那一小冊他們所印發的「董時進先生言論集」上，他指給我看了這樣幾句話：「爲什麼說政府此一措施（即解散民盟）對於政府自己的影響可能是害多於利？因爲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爲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已的長處去對附共黨的短處，使人民感覺在現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容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

文章擺在桌上，我記起了那些話的確是我寫的，我當然不能否認。不過我說，那幾句話，並

不能代表文章的主要精神，該篇文章的主要精神是爲民盟辯護的，決不是爲批評共產黨的。李先生說：「這篇文章對於民盟的意思是好的，但對於中共的確不好。你說的是人民害怕共產黨專制，（他特別强調人民二字），不給人民自由，現在你董先生到了解放區來，到底你覺得自由不自由呢？」我在北平尙沒有感到行動上的何種不自由，雖然我已經知道，有許多正常的活動我們仍然不能從事（如開會和發表言論等）。至於我在天津碼頭上所遇到的一樁事情，我是不便告訴他的。

李先生另外又翻出了一篇文章來，那即是我在經濟評論上所發表的關於土地改革的論文。他說那篇文章是替地主辯護，反對中共的土地政策的。我說我對於土地問題的看法不同，我不主張將一切土地沒收來平均分配。我說，鄉下人的土地，和城裏面的房地同是財產，而且鄉間的地主多是由勤儉刻苦而來，他們的家屋更遠比不上城市的富人。城市的大戶人家的財產尙且一律要保護，而鄉下的土地房屋一切要沒收分配，這是太說不過去的。他答復道：「城市的房產等是進步的，鄉下的地主是封建的，兩者不能相提並論。」我雖不能同意他的說法，可是這裏面的話說來太長，不能在那種場合多所爭辯。我只說，將不自耕的土地儘量分配給自耕的農民，這原則是好的，可是不能無償沒收，應該給價。我建議先將沒收的官僚資本和貪官污吏的財產拿來充用，不

够時政府再想辦法。他說政府沒有這筆錢，這事是辦不通的。

末了他勸告我，農民黨最好是結束，不必搞政治，專門搞技術，從事生產建設的工作。他叫我回去同本黨的同人商量一下。我說，我們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這般人原本不是要搞政治的，只要政治上了正軌，民主實現了，大家可以安居樂業，我們寧願下鄉種田或幹技術工作。

李先生最後表示，雖然不能承認農民黨，但認爲我們都是一些好人，不是壞人，所以仍然願意招待我們。但是他強調聲明，招待我們，不是以農民黨領導人的身份，而是看在個人的身份。我們雖承統戰部招待，但我爲進出及會朋友等方便起見，却始終未住進他們的招待所。話談約有一個多小時，李先生招待我午餐後，我才告辭了。

共產黨不願意接納農民黨，本來是毫不足爲奇的，因爲他們早知道我們和他們的性質和主張都根本不相同，是絕不能搞在一起的。但是他們雖認識我們，我們却不認識他們。直到我們到了北平之後多日，我才逐漸發覺，我們和他們的距離相隔太遠。

農民黨停止活動

中共方面的態度，既經這樣明白的表示出來，我們就無須再存任何幻想了。於是我們邀集了本黨在北平的幾位負責人將這問題作一個討論，大家一致認爲在目前及今後的情狀之下，勢非停止黨務活動不可。但活動可以停止，黨却不能解散，因爲中常會根本沒有這大權力，而中全會和代表會在那種時勢之下，則根本無法召開。於是一致議決，建議中常會停止黨務活動。中常會隨即將此案迅速的通過了。

因爲南京的黨員反對，所以我們擬好的停止黨務活動的宣言擱置了廿多天，等候他們派人北來交涉，直到不能再等的時候才發表了。但發表後不多幾天，南京的人又到了。幸而那位代表並無任何堅持的意思，他到後從各方面一探聽，就了解我們的處置是恰當的，需要的。他帶着兩封本黨一位黨員給民主黨派某兩位領袖的介紹信，託他們幫忙促成農民黨參加新政協。這時候新政協籌備會議已經開過多日，所有參加政協的黨派團體的全部名單及每單位的名額都已經決定和公佈，所以這兩封信所託的事情，只好說是明日黃花了。不過那兩封信裏面，另外還有幾句責備我

個人的話，說我頑固，對於「民主運動」，如要求參加新政協一類的事情，不但不領導大家進行，反而需要大家來推動。並說黨內不乏前進分子，不能因我一個人關係而使整個黨被摒棄。這兩封信原不是預備給我看的，不過既然寫信人並未囑咐說不許給我看，所以就給我看了。惟有遇着這種機會才可以得到別人對你的老實不客氣的批評，這種批評常常是很可寶貴的。我驟然看見那一些話雖有一些不快意，然而我冷靜地一反省，却不能對那位寫信的朋友有絲毫見怪的意思。他說的是眞話，他以爲我頑固是有他的理由的。他確實很多次鞭策過我，並與我强烈地爭辯過。他是本黨最「前進」的分子之一，首先主張發表響應新政協的宣言最力的是他，促我赴香港和北上最力的也是他，堅持反對我的土地論文的也是他。他是一個極其熱心直腸的朋友，儘管他有這許多地方和我的意見不一致，然而他始終是和我很友好的，並且是熱誠擁護本黨的。爲什麼呢？他常說過，他雖不贊成我的某一些主張（當然不是一切主張，）但是他知道我的主張是由於問題的看法不同，絕沒有私意存乎其間。

那位寫信的朋友說我不能領導前進，反而需要推動，當然不是說一切事體都是如此，而是指的關於與各「民主黨派」特別是中共取聯絡和進行參加新政協的事情。我捫心自問，還是我不能否認的。爲什麼會是這樣？坦白地說，我對於共產主義和中共的政策，一直是有幾分懷疑，而同

時又不能作一個機會主義者。我是一個懷疑者，對於任何事情，非有眞憑實據，確實認清楚之後，是不肯輕易信從的。我想任何曾經受過較長時間的科學訓練的人，都不能不是一個懷疑者。我不信仰共產主義，也不信任蘇聯，我們之所以企圖與中共聯絡，乃是因爲它所號召的並非共產主義，也尚未發現它有企圖作蘇聯附庸的確証。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有許多關於他們使用殘酷手段和極端措施的傳說，隨時達到我們。而這些傳說中，有些是從很可靠的方面直接得來的，例如認識的朋友的父兄遭殺害，受慘刑，以及他們在離開家鄉以前所親身遇到或見到的事體。總之各樣矛盾的消息，不能不使人疑信參半，不能全心全意的信仰共黨。內心既是疑信參半，行動如何能勇往直前呢？但是我又惟恐我自己的判斷有錯誤，不願一味固執一己之見，所以在有一些時候，寧可放棄自己的意見，聽從他人的主張。這即是那位朋友所講的，被他們推動的一個解釋。

有幾位我們的同人常常忽略了我們自己的政治立場。農民黨有農民黨自己的一套主張，在我們的政綱上和成立宣言上都載得很明白。農民黨是以和平及民主爲中心主張的政黨。它的性質是溫和的，漸進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它堅持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反對專制極權。我們的卅七年五月修改的政綱，第一條特別標明了「反對一切極權政治」一句話，這句話是經過詳細研討然後定出來的，並非隨便拿來湊篇幅的。共產黨的政治是民主，還是極權，並不是已經完全確

定毋需再考察的問題。此外我們的屢次的中全會的議決案也都說的是對於國共兩方取中立的態度。在這些政綱條文和議決案之前，處到我的須負責任的地位，自未便拖着一個黨就往一邊跑。有一些人一看見中共的勝利，不免過度興奮，竟忘記了自己的一切，只想一邊倒。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想法。農民黨絕不是爲參加新政協而成立的，在農民黨成立時根本還沒有人想到什麼新政協。所以假使有人認爲農民黨沒有能參加新政協便是失敗，而感覺灰心失望，他必是昧於農民黨產生的由來。還有一點更重要的；農民黨起初之要參加新政協，決不是爲的擁護或附和任何黨派也不是爲的任何人的私利，乃是爲取得政治發言權，以便發抒和實現我們自己的政見，糾正共黨的偏見。這即是說：我們所持的態度是一個爭取的態度，而不是捧場的態度。後來的事實表現出來，我們才知道，這種理想（即在議席上以自己的意見去糾正共黨的意見）在新政協的情形下，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

「民主專政」

我雖然對於中共的理論和措施懷疑日深，但是在七月一日毛澤東氏「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發表以前，我希望中共變好的意思，還是沒有完全拋棄。我還以爲它在完全成功及正式掌握統治權之後，仍可能糾正它的錯誤。但是，那一天我將那篇論文仔細閱讀了之後，不能不使我大爲驚詫，並感覺絕望了。

我感覺該篇論文裡面所說的一切，都與我素常的認識，和所知道的事實，是完全相反的。他說西方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我明明知道，那些國家裏面的農民和工人，不但是政治權利和資本家完全平等，而且他們的確對於國家的政策和政治的人選有極大的支配力量。他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我却曉得這個主義是非常粗陋而且不合後來發展的社會實情，尤其與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狀是不相符合的。他說，美國國內的危機很深重，及美國要奴役全世界，我深知道這是絕對不確的誣衊。他說，新政權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我却看不見一個工人在領導，也想不通整天忙着做工的工人，如何能够有領導政治的時間和技能。他說，人們以

爲中國需要英美的經濟援助，乃是一種幼稚的想法，他認爲眞正友誼的援助只能向蘇聯一方面去尋找，而不能向英美去尋找。但是誰都曉得，這種說法是與過去的事實及一般人的認識完全相反的。美國歷來對於中國的援助最多，打敗日本是靠的美國，最近送來救濟物資的也是美國，蘇聯不但從來很少援助過中國，而且有不少的損害中國利益的事實。

該篇論文揭櫫了「一邊倒」和「獨裁」兩大政策，這是很使人驚諤的（現在似乎已經聽慣了）。無論過去是怎樣情形，至少就第二次大戰以後，中國所處的環境而論，中國是很適宜於獨立發展的。即使要尋找一個特別互惠的友邦，當然應該找剛才幫助我們打敗敵人的，歷來對中國人民友好的，而且有意願並有能力幫助中國建設的美國。爲什麼反而倒向一個侵略我西北領土、侵佔我東北利益的蘇聯呢？細看該篇論文，不僅是要倚靠蘇聯的援助，而且是要與蘇聯及其他「新民主國家」「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換句話說，這就是要和蘇聯等國結爲戰友，以向美國挑釁。美國有什麼對不起中國的地方呢（或許是對不起中共）？要和美國爲仇有什麼好處呢？難道中國還能够戰勝美國嗎？爲什麼不與各國和平相處，而偏要捲入漩渦，爲蘇聯而犧牲自己呢？這一連串的問題，不斷在我腦子裏面盤旋，使得我的頭整天發暈，使得我迷惑而且驚駭。儘管文裏面說了一些必須倒向蘇聯的理由，然而那些理由，無一不是與常識相違反的，如何能相信呢？

「獨裁」，這不是中共一直用來攻擊蔣介石的嗎？現在自己竟公然宣告要獨裁了。論文上說，他們的獨裁是「人民民主獨裁」，或叫做「人民民主專政」，單是這些話語就够把人弄糊塗了。民主就是民主，爲什麼又是「人民民主」？難道還有不是人民的民主嗎？民主便不是獨裁，獨裁便不是民主，到底什麼叫「民主獨裁」？說「人民民主」等於說「狗拉的狗屎」，莫非還有貓拉的狗屎麼？說「民主獨裁」或「民主專政」，等於是說，「白色的黑狗」，或「黑色的白狗」。「人民民主專政」，或「人民民主獨裁」無異乎說，「狗拉的白顏色的黑狗屎。」共產黨的强詞奪理，不但不能自圓其說，甚至詞句的矛盾和不通也顧不得了。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到了我寫稿的這個時候，「則民無所措手足」的現象，已經充分表露出來了。這都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必然結果。孔子由名不正言不順推論到民無所措手足，往昔我不懂得他的意思，如今方知這是很靈驗的眞理，的確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高明，比馬克思高明得多。

毛氏說，他之所謂專政或獨裁，指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廹這些人。」這都是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話。四個階級的人數佔了

中國人口的一大半，他們如何獨裁或專政法？果眞是他們握政權了，那已經不是獨裁和專政了。揭穿來說，這明明是共產黨的獨裁，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共產黨的少數領袖的獨裁。而且這個獨裁並不專是對什麼「帝國主帝的走狗」等等獨裁，而是對一切人民獨裁。這種情形到後來已經表現得極其明朗了。試問現時哪一個階級不受壓迫？哪一個階級還有自由？

「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這一句話，特別使我激動。地主階級怎麼會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呢？鄉下的地主，與帝國主義渉不相涉，甚至於可說是帝國主義下的犧牲者，爲什麼硬誣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呢？凡是稍多有幾畝田地的，或雖有田地很少而不能自身耕種的，都可以叫做地主。這些所謂地主者，多是由於善於經營及勤勞節省起家，並未沾到任何帝國主義的恩惠，也絕對不是什麼封建制度的產物。只是因爲中國的政治哲學和社會風氣自來重視恆產恆業，以故一般有志上進和願意穩妥的人民，都歡喜置產落業。任何有志向，有能力，不惜付出代價的庶民百姓，都同樣有買田購地的機會。這種風尚，乃是安定社會，奬勵勤勞節儉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文化數千年綿延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爲什麼共產黨一定要打破這種制度，把地主當作仇敵，而亂栽罪名呢？這些眞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抗戰時期，我在重慶與中共人士接觸時，不是他們曾經宣稱該黨的政策不單是只減租減息，而且同時還强調保租保息嗎？現在却把地主明定爲「帝國主義的走狗」，要對他們實行專制和壓迫了。這豈不是前後完全矛盾嗎？還有，外間不是已有人想中傷農民黨，說農民黨是代表地主嗎？這無異是誣衊我們是代表「帝國主義的走狗」了。我們還有存在的餘地嗎？單就我個人說，我家裏所有的田地雖不多，却也可以算是一個地主，因而也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共產黨要專制壓迫的對象了。我還有何勇氣，有何面目，側身於共產黨政權之下呢？

毛氏再三强調要壓迫地主等階級，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對他們決不講仁慈，決不施仁政，他認爲他們都是野獸，他說，「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對於「反動派」必須「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他認爲軍隊，警察，法庭等都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是暴力」。他這樣地說：『「你們不仁」。正是這樣。』這是何等乾脆，何等氣盛的話？這等於說：「老子就是這樣兇惡，就是要打你，你敢怎樣？」有權力在手上的人，原是可以如此說話的，誰能把他怎樣呢？凡是不樂意或害怕聽這種話的人，只好各自走開，走到千里之外去，看說這種惡話的人能够兇惡到幾時。

這一切的話，到後來大家已經聽慣和見慣不怪了，但是在當時聽見到，却是非常之刺耳和刺眼的。這一下的刺激可把我的頭腦完全搞清醒了，把我的疑惑一齊澄清了，把我的幻想整個擊破

了。我決定早日離開北平，越早越好。我決定不與共產黨政權發生任何關係，我只想找到一種爲他們可以容許的維持生活的方法，當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離平南下

毛氏的「民主專政」論文雖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激，使我下了最後的決心，但是我只能把我的刺激和決心放在自已的肚子裏面，完全沒有擘張出來。因爲，很明顯的，假使我一表示出來，很可能於我發生不便的地方。我想走，但是，要走路，沒有共產黨政府所發的路條子是不成的。我曾經向管交際的人員商量過幾次，都沒有結果，但是我亦不便催促過急。這時候，「全國科學工作者會議」的籌備會正快開會，統戰部方面的意思要我參加。起初我以本黨一部分人反對本黨任何人以個人資格參加新政協爲理由，謝絕參加該項會議，要求早日返滬。但是幾位朋友勸告我不可不參加，否則恐引起誤會，以致返滬後隨時受到注意。我採納了這種意見而出席了，而且出席得少有間斷，雖然終一星期的會議，我未曾發過一言。

在這開會的幾天，我聽見過好幾位中共領袖人物的演講，那些演講都是以宣傳及說服爲目的的，而講詞的內容則多半免不了歪扭，牽强，半眞理，和黨八股化等毛病。我看見了會場上討論議案的情形，使我感覺到過分的順利，單調，和寂靜。我注意到推選職員和新政協代表的辦法，

人選一概是由主管方面預先商定提出，一提出絕沒有不通過的。這幾天的會議更加强了我的決心，和證實了我的認識。

會議開完之後，代表們分成兩批出發，一批南下，一批去東北參觀，我便在南下的一批名單上簽了名，承主管方面發給護照和火車票，於是我離平返滬了。這時間大約是在七月中旬。後來聽朋友說，北京中共方面有人說我是不辭而別，但我却並不是偷跑的。

我回到上海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選擇今後生活的職業，我知道我不但不能做新政府底下的官吏，連教書也是不成的。因爲我所專門研究的農業經濟學，是與共產黨的基本理論無法割開的。除非完全昧着良心，背叛素來的信仰，另撰一些假話，否則一開口就有和他們的理論發生衝突的危險，這當然是決搞不好的。我很願意回到重慶的一個農場上去繼續經營，但是那時西南還沒有「解放」，交通完全斷絕，無法通過封鎖地帶。再說經營農場又牽涉到土地問題，土地將來根本要分掉，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經營。在未分地以前，也有工人問題，公糧問題等等，都是不少麻煩的。我想來想去，才想到了一條路徑，養蜜蜂吧。這事體不須要多的土地，不須請多的工人，等於養一羣小賊，飛到別人的花上去替我偷蜜回家（實際上這是對於花有益無害的）。我暗地笑道，這個年頭，只有搞這種勾當是聰明的。

致書毛氏勸阻土改

我開始養蜂，製蜜，賣蜜，並和朋友合作開辦了一個養蜂講習班，以資推廣。此事一上了軌道之後，一件早說要做而未做的事體，又從心坎底下翻上來，堅決地催促我把它做了。在北平的時候，我就想寫一封信給中共當局，詳詳細細說明他們的土改理論和土改辦法的錯誤，勸他們修改。我曾經和幾個朋友談起這個意思，他們都勸阻我，認爲這不但不會被採納，而且恐怕要徒惹麻煩。同時在旅居中生活不安，心緒不佳，曾經幾次提筆起了一個頭，畢竟沒有寫下去，但是我心理面總覺得有一個責任未了，於心總是不安。目前心緒稍定，於是決心去完成這一件工作。我認爲共產黨和城市社會的一般智識份子，對於這土地問題，都是成見和偏見太深，非說得透澈一些不能使他們明白。所以我費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去思索整理，才完成了那一篇給毛澤東的長信。這一封信可以代表我對於土改的一些見解，並指摘中共的政策的不合理及其弊害，頗爲詳切，尚有閱覽的價值，茲不嫌冗長，將全信除掉開首的一段客套話而外，照錄如左：

「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說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剝削性的，所以應該廢

除。我們固不能否認若干大地主，例如軍閥官僚惡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說一切的或多數的地主富農，以及整個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則未免言之過當。何以故，請申說之。

甲、爲何不能說整個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這些條件並不足以構成封建性。因爲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舶機器牛馬等，無一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爲是封建性，何以獨認爲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說，土地與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應同一看待。這種說法也純然是錯誤的，必須加以糾正。

農業土地決不應視爲天然物，而實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須開墾，纔能變成耕地，而且開墾僅僅是使天然的土地變成農業生產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於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披荊斬棘，鑿井挖塘，開渠築隄，平整地面，砌築梯田，作埂掘溝，排除積水，培養肥性，開闢道路，修建橋樑等許多事項。這些設施乃是土地生產及支持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沒有這些設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產，或者只能很短暫而且微少的生產。所謂農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這許多改良工作後的總稱，與都市的房產是地皮加上磚瓦泥木等的構成品的總稱，其理相同。舉幾個特別顯著的例子說：譬如長江及各大河流兩岸防水的堤壩，如洞庭及各

湖澤周圍的圩隄，如江南羅網似的水道，如華北密佈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邊防潮的大壩，如南方遍地所見的池塘，諸如此類的人造成的成績，都是與土地的生產力不能分離的，也可以說即是農業土地的一部分，而且是較重要的一部分。農地的價値，主要的是在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經開發過的邊遠地方，土地幾乎一文不值，而已經開發及改良的農業土地，則價値非常高貴。不多年前，察哈爾綏遠諸省放荒招墾，每畝定價一角，而承購者寥寥，然而內地熟田則每畝至少値數十元，超過數百倍之多。這超過的價値即是人工開發改良的結果。固然這些開發改良的成績乃是累代無數人力所積留的，而不是現在的土地所有者所親手做成的，但是他們曾經付出過相當的代價。城市的房屋也並非房主自己的勞力所造成，他們也不過是付出了代價。

過去一般經濟學家不僅當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爲它有不可破壞性，現在的經濟學家和科學家都知道那種學說是錯誤的。在一些農牧方法不良好的國土，耕地和牧場被毀壞而放棄的，動輒以千百萬畝計，所以才產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偉大運動。中國的水旱災之嚴重，和農業生產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農業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糾正這種錯誤觀念，仍當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毀壞，

以爲可以聽其自然，毋須繼續不斷的維持改良，培養肥力，則充其極非使全國變成沙漠與澤國，並使整個民族滅亡不止。

乙、爲何不能說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鄉下買田地，乃是一種比較守舊的，小規模的保存錢財的方法，大有錢的軍閥官僚買辦等並不喜歡多買田地，即使買一些，也僅僅是爲安置他們的錢財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門，並非以鄉下的大地主著稱。這些大富豪的財產，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國。在城市買一畝土地或一座房屋，要當在鄉下買幾百幾千或幾萬畝田地。錢很多的人嫌在鄉下買田地太煩瑣，只有二三流的有錢人纔歡喜在鄉下買田地。至於鄉下土生土長的地主富農，槪是一些所謂土財主，他們絕對够不上封建的資格。他們中間雖不免有少數土豪惡霸之類，然而究以馴良的人民佔多數。他們大都是一些勤儉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們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雖然他們也放帳（鄉間凡有積蓄的都放帳，固不限於地主富農。特如雇農賺得的工資，農婦賣鷄賣蛋的存欵，爲數不多，不好作別的用途，便只好放帳，而這些小額放帳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說他們粑家，主要的是由於放高利貸剝削貧民，則殊不足信。因爲貧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來，即使他們想借帳，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錢，也只能借到很少的數目。鄉下不怕出

高利大宗借債的，多屬一些染上嗜好的，懶惰浪費的地主，他們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帳。至於勤儉的農民，誰都知道高利貸的危險，決不肯輕易借債。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損失，或有緊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親友幫忙挪借，並不一定要走高利貸的路子。所以即使說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農是由於放高利貸起家，然而他們所剝削的也多半是一些墮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貧僱農。

讓我舉幾個關於地主和富農的實例給你聽，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觸到的事實：

一個五十多歲的三輪車夫同我談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貧農出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共有一百廿多畝地，現在他的地都被分給當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滿十畝，不願在鄉下種田，所以到城裏來踏三輪車。他很感覺憤恨不平，他說出這樣一句傷心話：『我們年年日日冒風雨暑熱在地裡做活的時候，那些人却在茶館進酒館出。他們游手好閒，吃窮用窮了，還說是被我們剝削了，要分我們的地。』

我家有一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買了二十多畝地，連原先所有的合計有三十餘畝。她以爲辛苦半身，可以回家養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給別人了。她只有一個丈夫在家，僅僅分得三畝，後來丈夫死了，

家鄉已經久無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沒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積蓄，全部化爲烏有，她的傷心和怨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遠的親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一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儉樸，歷年積下錢來，添買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吃鴉片，分家後不多年已將田地賣光。老三早將全部田產賣去，將錢拿在城裏做買賣，發了財，已經買了幾處房產，並有不少的現款和貨物。現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進來，老三最有錢，但他的全部財產在城市，不致遭受損失。最壞的老二佔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爲老大叫屈。

這些不過是隨意舉出的幾個例子，類此的事例太多。實際上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國自古就產生了『有恆產者有恆心』的哲學，歷代政府都鼓勵人民買地，稱爲落業，一般人又向以爲土地是最安全的財產，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歡喜把積蓄變成土地，從來沒有人把買田購地當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體，也沒有人把出租田地當爲是一種封建剝削的行爲。

在以前的帝俄和許多歐洲的國家，土地大多爲貴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乃是

由那些貴族大地主，像一個一個的小國家一樣，將它一代一代的傳襲下去。地上面的農民也沒有遷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須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隨同土地被出賣給另一個貴族。那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纔可以說眞是封建性的。中國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爲，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說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我曾經費過很長久的時間，並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於我腦子裏面的成見偏見，去仔細的考察思索，始終找不出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農的封建性在什麼地方。

除了這些關於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論而外，我還另有幾點意見和事實，要提醒您：

一、新民主主義規定要聯絡小資產階級；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無疑的是以鄉間的中小地主及富農爲主要部分，除去了他們以外，殆無所謂小資產階級。現在對於城市的大資產階級尙不沒收其財產，反而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主和富農要沒收其土地及財產，這是把他們當作敵人，與新民主主義的宗旨完全違背。

二、大戰以後，開國之初，最急之務莫如安定秩序，醫治創痍，使人民休養生息，不宜再有搖動人心之舉。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獨在鄉間，爲推行土地改革政策，

正在從事調査及組織工作，準備分掉地主富農的土地。這不啻磨刀霍霍對他們表示：『磨快了就要將你們開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線尚未確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將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們不但不能慶太平日子的到來，反而感覺還有大難在後頭，還決不是開國時所應有的現象。

三、國家並未廢除財產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屢次聲明保護私有財產。土地是鄉下人的最主要的財產，也是正當的財產，現在政府對於城市富人的一切動產與不動產，和工商業的生產工具都加保護，乃單獨沒收鄉下的土地，而且沒收分配之後，依舊准許私有及出租，這樣無故奪去一部分無辜人民的財產給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與中共保護私有財產之聲明不合。

四、新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爲範疇。平分土地的辦法，則是無論自耕與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這種辦法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兩端都不符合。

五、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爲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爲他們的能力較强，工作較勤，花費較省。雖有不少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然而自身由貧農起家者亦很多。

即使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亦必須其自身健全，否則必然衰敗。這即是說，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但這決不是說，貧農都是低劣的分子，因爲在戰禍綿亙，百業不振的情形之下，多數人都沒有改善他們的境遇的機會。但是，無論哪一個貧農都沒有不願意成爲地主或富農的，若說他們之所以沒有成爲地主或富農，乃是因爲他們的道德特別高尙，不願意剝削他人，則決不足信。國家當然應該幫助這些貧農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但幫助他們的正當辦法，是在和平恢復之後，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多創造就業的機會，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賺到豐富的進款，而不是分給很少幾畝土地，把他們羈縻在小塊的土地上面，使他們繼續留在農人已嫌太多的農村裡面討生活。他們耕種那樣小的一塊土地，終年勞苦的結果，除去了糧稅及各項開支以後，根本還是不够維持最低的生活。

六、歷來政府的稅捐多是以地畝爲主要根據，今後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現狀，推行累進稅率，將重稅駕在大富人身上，而減輕貧民的負担。若是將地土一律平均的細分了，則每一戶有一小塊土地的人家，都須平均負担國家的開支，不但他們會感覺繁苛，發生怨恨，同時政府收稅的困難也會增加。

七、中國的耕地，本已嫌分割過分零碎，於經營上頗多妨礙，再要人人平均細分，不問有無農事的經驗和興趣，亦不論經營能力的大小，都同樣分給一定面積，必致更減低經營的效率，減少農業生產。

八、有一些人說，土地改革之後，因農民生產情緒提高，結果使產量顯著增加。我們對於這話不能毫無保留的接受。究竟這生產的增加，（除去天時等原因而外）有幾分是由於共產黨員的鼓勵督促，有幾分是由於農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緒，是不易分判的。換句話說，假使沒有土改，只要共產黨員能同樣的去督促號召，或許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還有不可不注意的，所謂情緒，只能是暫時的，久了就會降低，由於一時情緒提高的增產，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長久的。在另一方面，這平分土地的辦法，不論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樣分給面積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強的，或許嫌不够做，懶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許還做不好。這種情形顯然是不會使生產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復之後，許多人都會嫌他們的土地太少，不够耕種，也不够維持生活，因而他們會紛紛出外做生意，或別謀職業。他們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給不能外出的老弱婦女耕種。到那一天，農業生產更非減少不可。

九、橫在分地政策的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分地是既定的政策，不過在新解放區暫緩實施，而先推行減租。即是說，土地是決定要分的，但是因爲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所以還要等待一些時間。究竟等多久，沒有說明，不過大家都以爲不久。因此無論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種者，都在那裏轉念頭了：現在是我的地，轉瞬就會變成別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種的，明年就許分給他人耕種了。那末，我何不趁早從地裏面多拿回來一點是一點，少花費一點是一點呢？管它池塘溝渠淤塞也罷，隄岸田埂崩垮也罷，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補？田地隨它瘦下去，何必費力氣去下肥料，更何必花錢去買肥料？甚至於平時應留還土地的穀稭豆根之類，也通通割回來或扯回來作柴燒吧。這樣下去一兩年，土地會變壞到什麼樣子，生產會減到什麼地步，是很够令人憂慮的。還有地上的樹木，如桑茶油桐烏桕，以及各種果樹和雜木等等，它們的命運尤其危險。地快要分出了，地上值錢的東西還不趕緊搬走麼？在四川解放以前，我接到好幾個朋友由四川來信，不約而同的問我：『地是不是眞的要分，樹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另外我又曾經從幾個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鄉下許多人都在那裏考慮砍樹的問題，並且已經有很多樹被砍掉了。有一些人還不肯相信土地眞會被分掉，有一些以爲分地政策還有改變的可能，所以還在那裏觀望。但是時間稍久，大家看淸了分地政

策勢在必行，就會不約而同的實行砍樹。這些樹木是民族的重要資產，需要多年的保藩，一旦大批的摧毀了，再等重新栽培長大，要到何年何月！

最後，讓我向您獻議一個辦法，請您考慮：

新民主主義不是還要更進一步轉變爲社會主義麼？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還要轉進到土地社會化和農業集體化麼？那末，何必多此分地一舉呢？現在像割肉似的將土地從地主和富農身上割下來，已經使他們很疼了，割下來分給貧民之後，不久又要從他們和大家的身上再割下來，那時恐怕困難更多了。何如現時不必分，待將來眞要實行社會主義時，直接把土地連同他種生產工具一齊社會化呢？

假使您贊同我的意見，請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並將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規定限地辦法，逾額者限期出賣，或由國家給價徵收，轉賣與自願耕種者，令其分年償付地價。老解放區已經分配的土地，雖可不必交還原主，但亦應令分得土地者補繳地價，（不妨稍低廉）不願者可以將土地退還。這樣，不但土地被分去者萬分感激，不會要求追算舊帳，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沒有抱怨的理由。本來誰也不會想把鄰人的土地無代價奪歸自己，現在補繳地價，確定所有權，他們也會感覺心安理得，釋然於中。

我對於土地改革的問題，曾經用過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經讀過好多篇主張分地的文章，然而總覺得他們的理由牽強，持論偏歪，根據也不可靠。不見於文字的民間輿論，一般都認爲這種辦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沒有成見偏見的，更不是因爲個人的利害關係而尋找藉口來反對土地改革。外間會有人說我是一個什麽「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說。我既不敢當這個頭銜，也不能受這個誣枉。我不瞞你，我辦得有一個果園，有一百多畝瘠薄的山坡地，爲整個國家的關係，我何在乎這一點小小的地皮，何況政府對於果園及新式農塲的土地早已宣佈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屢次反覆辯論，此次更不顧冒犯您的危險，乃是因爲我感覺我對於這土地問題了解得比較深刻，比較正確；假使不將我的意見儘量發揮出來，我會永遠感覺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中國，對不起無辜被奪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愛好眞理，並能服從眞理的，當您發覺政策有錯誤之時，您一定是能勇於改正的。」

此信後段提到土地社會化問題，勸他不要沒收人民的土地，等到以後眞要實行社會主義時，再行社會化。很明顯的，我並不是主張社會化的（實際我是反對社會化的），我的意思乃是要他先行停止目前的所謂土改政策，等待將來再說。另外還有一個用意，即是提醒一般人知道，共產黨的眞意思決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將一切土地都收爲國有，叫那些分到田地的人也不必空

歡喜。

這封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間寄出去的。我將這封信印了幾百份，同時寄發給中共的若干要員，各黨派的領袖、和若干關心或研究此問題的朋友，及教育學術機關。剛好把致毛氏的一封信交郵之後，不記得是過一天或兩天，報上就發表了他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這一去差不多就是兩個月，就擱了兩個月回來，政務叢集。哪裏還有工夫來理會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黃花的舊函。所以我很欣幸以爲這印發的辦法很聰明，否則將等於石投大海了。不過後來却正因此惹出了一些麻煩，詳情容後再述。

回到重慶又進公安局

這時候「解放軍」往西南迅速推進，不久重慶已經「解放」了。待我的信寫好並印發了之後，不多日滬渝航運也告恢復了。於是我請好通行證，帶了兩箱蜜蜂和夏季衣服等，起程回川。準備至少住下大半年，到多季果子收穫之後再作打算。

費了整整廿天的時間，換了幾次船，睡甲板，像豬仔似的被趕來趕去，才到了重慶。在重慶城裏住了一宿，翌晨預備下鄉，一起床忽聽說街上戒嚴，菜不能買，什麼人都不能通行。我的住處是一個小巷，我想到巷口去看看大街上究竟是什麼情形。一開大門，立即被站崗的兵士喝止，叫我進去，把門關閉起來。直到下午約兩三點鐘解嚴，才知是爲捕「特務」，大街小巷一律不准行走，甚至朝街的門窗也不准打開，商店苦力和一切活動，總停業大半天。次日報上說，從前一夜開始，一共抓了一千多名。方法之嚴密，佈置之週到，使指名要逮捕者無一漏網。

我一回到農場，就接到西南軍事管制委員會交際處寄來的一封信，說有要事約我去該處面談。發信的日期恰是我抵達重慶的那天。我從上海到重慶是臨時決定的，沒有通知任何人，重慶的

親友都不知道我回去，至於交際處是如何於當天就知道我到達，並立即有信給我，我至今還是不曉得。大約過了四五天，待我將農場上比較緊急的工作料理之後，我入城拜訪那位交際處的職員。我去了兩次沒有會到人，於是我留下一張名片，批明城內住址，請他指約時間通知。很奇怪，我在重慶城鄉共住了一個多月，始終未接得他的回信。直到我又回到上海之後多天，才接到由重慶轉寄來他的通知，再約我去見面。當然我無法再去，也始終不知道他要和我談的是什麼事情，以及因何就誤了那樣長久的時間才有回信給我。

在我入城赴交際處之後，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在一個陰冷的，毛毛雨的早晨（係二月初旬天氣），約八點鐘的光景，我已比平日提前吃過早餐，正要同工人們出發運檸檬進城裝輪運滬的時候，突然有一位武裝同志到農場來找我。他腰上掛一支手槍，並圍滿着一腰的子彈，是一位智識份子，態度相當客氣。我起初當他是交際處派來找我的，談談才知道非也。他也是軍管會派來的，我問他是屬於軍管會的何部分，他似乎不願告訴我。待我再三追問時，他才答道是公安部分。他仍然不肯直說公安局三字，因爲那三個字，任何人聽到都不免會有一些刺耳，誰都不願意有公安局的人來找，誰也不歡喜到公安局裏面去。我問他不遠數十里跑來有何緊要事情，他答沒有什麼緊要事情，只是來談談。於是他問了我一些關於農民黨的問題，問何以沒有參加新政協，有

多少黨員，分佈在一些什麼地方，是哪一類的人比較多，政綱的要點如何等等。我都一一答覆了。關於何以未參加新政協一點，我告訴他我們的土地政策和中共的有一些不同，是一個原因。我提起我關於土改問題向毛主席建議的事情，他問我那封信的大意是如何，我約略告訴了他。我說我有事要進城去，請他同我一邊走一邊談。我們一同走到嘉陵江邊，在碼頭上的小茶館候船，等了約半小時，隨便談了一些地方上征糧的情形等等。我們還要坐大約一個鐘點的木船到磁器口，然後換汽車到重慶。船快要到磁器口之時，那位同志才告訴我，關於我上毛主席書的事體，他們希望我去談談，獲得互相了解，以便今後彼此好合作。他說，他們已經指派了對於這問題有比較深刻研究的人同我談話，要我同他去一趟。我問指定的是什麼人，他不肯明白告訴我。我問到什麼地方，他說到保安路公安局。我問這種事體也歸公安局管麼，他說是的。我現在才明白了，他原是公安局派來傳我的。我說，「我同你進公安局，人家要當你是抓到了一個特務，不大好吧。」他笑道：「不至於，不至於。」停了一會兒，他又說，我們走後門進去吧，後邊是一家銀行，從那裏進門，不會有人注意。我們在船上時，他也發表了一些關於土地問題的意見，雖然他的見解總是不離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的，但是由他的談話，可以看出他是曾經用工夫去研究過，並懂得這個問題。我一方面雖然不歡喜被傳詢，但我是不好不去也不能不去的。並且我也願意去一趟

高論，看他們究竟有什麼精深的道理，可以開我的茅塞，使我放棄我的見解。

我們從八點多鐘由農場出發，經過木船，長途汽車，及泥濘道路上的步行，約在十二點後，才到達了公安局。那位武裝「同志」一直把我帶進了一位王科長的房間。適值王科長不在，據說是往市政府開會去了。他又帶我到另一個房間，給我倒了一杯微溫的開水，叫我候一候，他去打電話找王科長。他回來說約需半個鐘頭就會回來。我由半個鐘頭候到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還是不見回來。那位「同志」出出進進好多遍，每一次進來都說，「快回來了，請再稍等一等。」那天是一個毛毛雨中夾着雪點子的天氣，坐完了一個鐘頭之後，就開始冷起來了，肚子也餓起來了，並且還有兩件急要的事體須得料理。所以我很着急，屢次要求另約時間再來。

他總是以「就快回來了」一句話留住我。一直等到四點鐘打過，王科長仍無回來的消息，我實在熬不住了，堅決要求另約時間，我說不拘今晚或明晨再來都可以，我決不食言。他才許我離開了，並對我說了兩句抱歉的話，約定當天晚上八時再去。

在這四小時裏面，令我最感痛苦的，還不是餓與冷，雖然那也是很難受的，而特別是那等候復等候，由半小時，一小時，二小時，三小時，延遲下去，始終沒有確實的消息和時間，而又躭誤急要的事情，這眞是最使人着急不過的。有過這樣等候的經驗的人，諒必了解其中的滋味。共

產黨動輒罵國民政府的官僚作風，但他們自己却如此的忽視別人的時間和事情。

晚上我再去會王科長，被招待在一間房裏面候着，據說王科長剛剛由房門出到院子去了。一個人從窗口喊王科長，告訴他有人找。一會兒上樓來了兩個人，同時走進房間，其中一個吩咐另一個出去了，他立即坐下就講起本題來，問我爲什麼將上毛主席的書印了許多到處散發。他沒有與我通姓名，也沒有來一個拉拉手的客套儀式。我至少要弄確實究竟與我談話的是誰，所以未及答復問題，我先問了一句「你是王科長麼？」他似乎沒有聽見我的神氣，不理睬地繼續說他的話。我打斷了他的話，再問道：「你是王科長？」他才點一下頭「唯」了一聲。他問我印發那封信是什麼用意，是否要想爭取一部分羣衆。他說他有好幾個朋友從上海來，據說，我印發得很多。他說，我根本不承認地主的封建性，這是與中共的基本理論衝突的。他又說，土改政策是共同綱領上所規定，經過了全國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才決定的，政府一定要執行。他警告我道：「我囑咐你，來到重慶不要再發，以免惹起不便」。他勸我多研究共產黨的關於土地問題的理論，如像任弼時同志的著作等。他說共產黨的書刊現在都不是秘密的了，街市上都可以買得到。他又說我有言論思想的自由，但是不能像這樣發表。他所要說的就是這幾點意思，他好像背誦一樣重複的說了兩遍。當他說我印得很多時，我說共印了四百份，至少還剩下一百多份，發出去的大約有二

百多份。他說，「剩下的你都拿在街上發了吧？」大概他心目中所想像的即是一個發散傳單的方法。當他說我否認地主是封建性的時候，我說，人民用他的積蓄和正當賺來的錢，買得來的田地，如何能算是封建？我又說，眞正軍閥官僚和大有錢的人在城市所治的房地產都不算封建，爲何鄉下人有一點田地倒是封建？他沒有同我辯論，只說，「我是一個老粗，當兵出身，不懂理論。」他說話時的態度，起初是正顏厲色，與審問人犯時無異，後來才逐漸地和緩下來了一些。話講畢，他立起來送我出房門到樓梯邊，說了一句，「對不起，沒有送。」

這次我在城裏大約住了三天才回農場，一回去就有工人對我說：「昨天來了兩個解放軍找你，一個揹槍的，一個沒有揹槍。他們說沒有事情，只是來玩玩。」我先以爲或許是什麼朋友，但再一請問，才知是從磁器口（重慶市郊外，離農場最近的一個鎮子）公安局來的。他們把我在城裡面的住址抄去了，把同他們說話的工人的姓名也抄去了。他們沒有留姓名，也沒有留什麼話，只是到處看了一看。嗣後無論是在鄉下，在城裏，那兩個人並沒有來過，我始終不知道他們來的用意是什麼。惟一可能的猜測，大致是來調查我有沒有什麼不法的活動吧。

大約又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在一個傍晚，也是毛毛雨的天氣，首次來傳我的那位「同志」又光臨了。這次他帶來了一封「通知」，裏面說：

「你對毛主席的上書，其內容及印發均屬錯誤，已經本處王科長當面談過，請你對上書印發措施寫一書面檢討送交本處！」署名的是「公安局第三處。」

他叫我簡單的立刻寫一個回信給他帶回去，我應允了。他跟着我走到書房，當面等着我寫。我一邊寫，一邊對他說：「想不到爲一封信，惹出這些麻煩。不是說共產黨是很虛心的嗎？一個人供獻的意見，你們以爲是對的就採納，以爲不對，不採納就是了。早知道是這樣，我就不該寫了。」那位「同志」誤會了我的意思，他說：假使董先生覺得自己錯誤了，請你就寫在上面好嗎？」我說：「不是這個意思，你們以爲我錯誤，我自己覺得並沒有錯。你們的領袖不是常教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爲何一表示了不同的見解，便要如此追究呢？」我並告訴他我在國民政府時代所幹過的一樁類似的事情：在民國卅一年抗戰時期，政府嚴厲統治輿論，有一段時間，因爲鬧糧荒，關於米糧的價格，存量，收穫和天時等消息，都被嚴格管制了，報上只准說糧食豐富，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都是由於奸商囤積壟斷。我寫了兩篇文章批評政府糧食政策的不當，無處可以發表，於是將它印了幾百份，到處分發，並寄給政府的要員。我幹了這事體，不但政府沒有追究，而且有不少政府要員回信稱讚我的見解獨到，值得供參考。末了我說：「你們現在的管制，比那時更嚴厲了。」他未置可否。他對於我要寫的答復，也未參加意見，完

全隨我自己寫。我只就何以印發一點，加以說明 大意不外是：一則恐怕毛澤東本人看不到，二則依照民主習慣，土地政策也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所以我必須將我的意思向其他有關係的人員建議，因而印了一些寄給其他各黨派的領袖，和政協的若干位代表。

在這裏我要附帶叙述一點事實，這封公安局的通知上所寫的，日前和我談話的是王科長，當時我一再問他是否王科長，他也點首承認是王科長。但是嗣後我從可靠方面得到消息，知道他並非王科長，乃是第三處的張處長！堂堂政府機關裏面的重要人員，何以竟會有這樣鬼祟瞞誑的行爲，乃是我所不解的。

籌繳公糧無理刁難

在幾天裏面，公安局的人前後光顧了我三次，我不能斷言以後是否要再來。但是我也無暇去管這些事情，因爲我另外還有很麻煩很緊要的事體需待料理，這即是農場上的公糧。今年的公糧比以前重得多，然而農場上沒有存谷，也沒有任何可以變錢的東西。同時谷價不斷飛漲，而且拿起錢到處收買不到手，本鄉鎭尤其缺乏，幾乎家家都要找谷上糧（本鄉在國民黨退出以前已經上過了百分之八十，這次是額外交第二次），而家家都沒有多餘的谷出賣，甚至於吃的也沒有。但是政府催收却逼得很緊，不如期繳納，就須得吃官司。我曾經出席過一次本鄉的征糧會議，征糧委員警告大家說：『你們切記不要說，「我家裏沒有谷子，不信你來搜，」這一類的話是沒有用的。不管有沒有，你們各自去想辦法。教起女人老婆子來哭來鬧也是沒有用場的。上吊跳水那些事情都不要搞，都沒有用場，千萬不要來這一套！』鄉長也告訴大家，無論有無，各人趕緊想辦法，哪怕你家每天只吃兩餐稀飯，也只好再減少一餐。總之要先把公家的糧上了來。由這些談話，可見征糧的認眞，是決不容許推延或拖欠的。經過多日的奔走，我幸而把欵籌到了，（現在不

比以前，借錢比較困難得多。）於是派人到四面幾十里的鄉鎮去收買谷米，不但價錢嚇人的貴，而且只能收零升零斗。那幾天的米過一天是一天的價錢，過一時是一時的價錢。所籌到的欵，如不能立刻買到米，馬上數目便又會不够了。那幾天令人惶急的情形可想而知。最後在城裏政府所辦的糧食公司買到了一些積米，事先並經商得地方收糧員的同意，毋須將實物運回本鄉，就用米條代繳。這乃是對於兩方都便利的，因爲我將米搬運幾十里到本鄉之後，收糧機關還得再搬運回去繳入公倉。但是等我將米條送去之時，忽然說不成，還是要將米運去。又經過多次的交涉，承認收米條子了，却又說米質太壞。這實在是更無理由的，因爲我所買的米原是政府賣出來的，政府既可賣給人民，何以自己不允接收？如果這個米已經由我提取出來了，還可說我可能將好米換成了壞米，但是我所拿到和送去交的，並不是米，乃是米條子。還可以說關於米質的問題，毫無爭論的理由。然而無論怎樣去交涉，總是一個不收，一天過一天，轉瞬過了舊曆年，事體仍未解決。一過年，米價更漲了，連官辦的糧食公司也好幾天不開市，後來雖開了市，價錢却大大地提高了。我所買到的米條子，交是交不出去，改也無法改換，我也只好讓他擱起來，拖下去。這事體到我離開重慶之日，還是未能解決，一直等我到了上海多日，才接到信，說征糧辦法後來和緩了一些，我的米條子也接受了，我然後才放下了心思。

爲奔走這些事體，我每隔三大兩天須得進城一次，每一次進城和出城，經過磁器口，都須受一次或幾次的搜查。不拘是紙包布袋，和身上，都要搜查。有時帽子也要取下來，鞋也要脫下來。同時那些檢查人員的面孔又是那麼可怕，他們的態度又是那樣傲慢，眞不能不使人把這條路視爲畏途。但是除非不住在農場，要住在農場則這條路總是避不開的。我原先打算回來守辦農場的計劃，至此就開始搖動了。

變更計劃離開農場

還有一件逼我離開農場的事體，那便是鄉下的治安失去了保障。我在這鄉間居住了近十年，從來沒有害怕過土匪。但是在我這次回去的數日前，鄰近曾發生過一次搶案，那搶匪也是本地人，跟着就被地方團隊和鄉民去包抄，人贓俱獲了。他們將這捕獲的土匪二人由本鄉數百農民聯名送往負當地治安責任的軍事機關，請求懲辦。孰知隔日這兩個土匪都被釋放回家了，他們榮歸之後，大放鞭炮慶祝。聯名呈控的鄉民，至此人人害怕報復，同時一切人家也都夜夜就心被搶。在我住農場的短時間內，附近曾經發生過好幾次匪警，我們每夜都不敢安眠，一聽狗叫，就起驚慌。這樣的日子太不好過，這也是使我不能不早日離開那地方的一個原因。

我本是決計在農場上住一個長久的時間，把農場好好整理一下的，但是這許許多多的煩惱和恐怖，使我不能不改變計劃，仍回上海，上海至少在目前還是一個比較的安全和自由的地方。

我回到上海：正是派公債緊急之時，上海市民紛紛往香港逃避，市面蕭條已極，我們的蜂蜜營業，也受影响，不得不縮小範圍，只在寓所前攤一小攤。後來公營的土產公司也在附近零賣起

蜂蜜來了，該公司售價特低，把我們的生意都搶去了。連一個招牌都沒有，每天出賣不過幾磅蜂蜜的小攤，也須得向好幾處機關登記，也須得繳營業稅，所得稅，出發票，建立會計制度，及參加民主評議等等。而且稍一疏忽，即有受處罰的危險，一罰起來，數目又是嚇人的大。我看見這種情形，知道做不得了，乃趕緊收場。場雖收了，而稅局工商局的手續，跑了好多次，過了好幾個月，始終沒有搞清楚。直到我將離開上海時，稅務局還去傳詢過好幾次。最後經立下字據，但保以後決不在任何地方再做這項生意，才算完事了。

尋求自由跑出大陸

還樣，我什麼都去親自嘗試了一下之後，我感覺士農工商行行都不好搞，只好在家呆着。但是呆着不但呆不起，而且很苦悶。因爲言論及新聞的不自由，無論關於政局眞相，社會實情，世界大勢，都無從得到正確的消息。自己有不同的意見，更無法去公開發表。儘管中共曾經屢次宣言，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也會經明白規定，「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敎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然而這僅僅是白紙上的黑字，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的，也沒有人敢於去以身試法。我不說過我自己曾經有過兩次的經驗嗎？一次爲了日記上的筆記和裁剪下來的舊報紙，一次爲了寫封信給毛澤東，都使我進了公安局。雖然沒有被判罪刑，可是已經够使我起戒心了。共同綱領上不是還有所謂人民與國民之分嗎？這兩種人類並無明確的界說，只消說你是國民，不是人民，即可以將你的一切權利剝奪淨盡（實際上原本就沒有）。任何持不同的或反對意見的人，都可以叫做國民，而不叫做人民，所以誰也是沒有保障的。毛澤東在他的人民民主專政論文上不是也說過，要向某些階級實行專政獨裁，壓迫那些人，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嗎？那些階級包括很廣，其中一個是「地主」。像我這樣的人，別的雖然說不上，然而因爲老家有幾畝薄田，這「地主」的頭銜是安得上去的，一安上去卽沒有任何人民的權利了，那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一個需要精神生活的人，突然發覺他的思想的來路（看和聽）和思想的出路（說和寫）都被關閉了，必然會感覺窒息，感覺空虛，感覺沒有前途。他的痛苦會比一個旣聾且啞又眼瞎的人還有更甚的地方。因爲已經聾了，啞了，瞎了的人，不能聽，不能言，不能視，腦子的要求自然也會變成簡單了，而强使一個耳未聾，口未啞，眼未瞎者去過聾子啞子瞎子的生活，必定是更難忍受的。癱瘓了不能行動，誠然痛苦，不癱瘓而不准行動，其痛苦必更甚。一個重視精神生活的人不難忍受粗劣的物質生活，只要不到飢寒嚴重的程度，他都是不大在乎的。但是，若將他的精神生活割去了，他便會感覺整個的生活沒有意味，沒有價值，沒有發展。人是需要發展，需要前途的，沒有前途，和沒有發展，即是停滯；停滯與死是沒有多大分別的。人死了，痛苦也就完結了；和死一樣的活着，却等於死了而還要受痛苦。這或許卽是「不自由毋寧死」的一種意義吧。我不敢自詡爲精神生活程度如何高的人，但是我不能不感覺精神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感覺我需要發展，需要發表，也需要吸收和了解他人的精神生活。這些，在共區內都是要受到限制和受到支配

的。

再說我們還有一個責任問題，即使說我們的一生已經不會有很多年，儘可以苟安下去，當一個聾瞎且啞的順民，然而我們就完全不爲後世子孫着想，不爲整個中華民國着想麼？我們不能不關心共產黨究竟要把中國拖到何處去。這是一隻大家所乘的船，而且是大家的子孫萬代都必須乘的船，眼看見他們硬要把它拖往黑暗和毀滅，我們能够漠然視之麼？

最近在共區裏面發展的情勢尤其使我感覺，我能趁早離開大陸，眞是非常幸運，因爲這使我逃脫了絕大的危險和苦難。

所謂退押的事件，目前正在各地雷厲推行，頓然發生了空前的恐怖，比逼繳公糧時還要恐怖得多。這退押的數目，依照共黨指示的算法，往往會使人傾家破產，也無法付清。因此，在監牢中受着酷刑和等着逼死或自殺的人，不計其數。我所辦的農場上有一股十年以前已經退佃，並同時退了押的水田，並且那個佃客也已經死去好幾年了，現在突然定出一個驚人的數目，超過那股水田的價値的數倍那樣大一筆數目，要農場交出。另外還有在我老家已經賣出去了好幾年的田地，當然押租也同時扣除了，現在仍要退押。由此可知退押的眞像是怎樣的。我的家鄉有信來說，退押之事急如星火，假使不急速設法付出，哪怕我在上海，也要把我找回去。又說，一定要現款

，房屋地皮都是不能充數的。這即是說，所謂地主者，即使土地財產等一齊不要，仍然脫不了手。他們要現錢，要性命。幸而我已經逃出來了，我雖然不是爲這樁事情逃走的，（因爲我出來時尙未發生這椿事情）但是，假使沒有逃出來，要我退出他們所定的數目 我實盡一切，也絕籌不到那筆欵子。住在共區的人民，就和屠宰塲裏面的猪一樣，要宰就宰。共產黨迫害人民的花樣層出不窮，起先表示十分寬大，等到他們一切把握穩妥之後，就越來越厲害。再往後不知道還有一些什麼把戲。這是何等可怕啊！共區人民是何等慘痛啊！這所謂退押，名目倒是好聽的，如其眞是退給佃戶也罷，然而並不是的，乃是退給農民協會，實際即是退給共黨政府。這些錢還不是輾轉運到朝鮮及越南等處變成砲灰了麼？什麼是退押？還不又是一個刮錢的名目麼？共產黨的書刊上曾經公然宣佈，他們的政策是要無情地剝削資產階級，他們的一切作爲都是執行他們的政策。我們可以料想，往後還有其他更猛烈的手段，因爲油越榨越乾之後，就非用更大的力量榨不出油來。但是油已經快乾竭很了，一點一滴都榨乾之後又怎樣辦法呢？也只有同歸於盡了。

繼續努力追求民主

追求了這許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後仍不免撲一個空，不僅撲一個空，而且發覺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比歷來更專制更惡劣的景象。這的確使人很懊惱。但是懊惱還懊惱，灰心仍不應該灰心，氣餒也不應該氣餒。我也並不灰心，並不氣餒。民主自由本是難得而可貴的寶貝，不是俯拾即是的塵芥。爲它們而奮鬥，是很值得的。一次追不到，二次，三次，乃至無數次；十年追求不到，三十年五十年；一生追求不到，還有下一代。最後總是可以獲得的。凡愛好民主自由的人，都不可吝惜重大的代價，永遠不可灰心氣餒，必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這樣，無論如何必有得到民主自由的一天。我仍願和一切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協同努力，繼續爲民主自由而奮鬥。

這次追求民主的結果，雖然發見的是專制，然而却有一事使我感覺是不幸中之大幸的：那即是，農民黨沒有參加新政協，我個人也沒有參加「人民政府」下的任何工作。假使參加了，不知道後來要痛苦到什麼樣子，也不知如何能逃出天羅地網。我雖沒有更早認清共產黨，但我認清它的時候還不太遲，我很同情憐憫一些棄權的「民主人士」和將領們，他們認識共產黨太遲了，陷入泥淖太深了，他們的苦痛和前途的危險，我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自由出版社叢書目錄

編號	書目	著者	定價	編號	書目	著者	定價	編號	書目	著者	定價
1	偽[illegible]的苦難	任 重	40	38	新民主在[illegible]	燕歸來	40	75	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	李 華	1.20
2	光復大陸戰略戰術	張仁征	30	39	今日東北[illegible]	劉耀挺	50	76	草澤之雄上冊（連環圖文）	蝶 恩	60
3	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	于平凡	70	40	遼河恨（[illegible]	素赤山	60	77	草澤之雄下冊（連環圖文）	蝶 恩	60
4	無法好轉的中共財政經濟	何自求	70	41	中共屠殺[illegible]	黃新民	40	78	中共屠殺實錄	張羽等	80
5	天亮前後	楚三戸	60	42	對日和約[illegible]	侯海域	2.00	79	我爲什麽反對共產黨	衞聚賢	1.40
6	辯證法的新發展	胡 越	50	43	共區回憶[illegible]	董時進	1.50	80	自由大合唱	史惟亮	1.00
7	中國局勢的必然發展	李微塵	60	44	粵共[illegible]	巴 頓	50	81	日本帝國面面觀上冊	李滿康	2.50
8	農村淚（連環圖文）	鐵天行	80	45	伍修[illegible]	余揚波	40	82	井崗山上的英雄	盧 强	80
9	紅蘿蔔（連環圖文）	蕭 英	80	46	挑戰[illegible]	鍾介民	50	83	胭脂虎（連環圖文）	江 滔	60
10	桃李劫	岑 樵	60	47	寄海外友人[illegible]	公孫紫鶯	50	84	中國紅都	易子雲	1.70
11	迫害	陳世民	50	48	血海[illegible]文）	吳一山	60	85	中國現代名人軼事	左舜生	1.20
12	血債	王祥鑾	60	49	血海[illegible]文）	吳一山	80	86	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	陳寒波	1.00
13	血濺虎丘山	芳 草	40	50	秧歌[illegible]	靜 宇	30	87	小鬼隊上冊（連環圖文）	華樹基	60
14	大陸民間新文學	張博望	40	51	歷史唯物[illegible]	胡 越	80	88	我走上金鷄山	莊 甫	1.00
15	桃李劫（連環圖文）	銳金戈	80	52	中共人物[illegible]	韋丹柏	1.20	89	今日遠東問題	薛澄江	1.20
16	愛與恨（連環圖文）	吳 鏡	1.00	53	中共的民[illegible]	蕭也納	1.00	90	蘇俄內部革命變亂眞象	張六師	80
17	王小明解放記（連環圖文）	司徒容	80	54	虎口逃生[illegible]文）	馬天驥	80	91	奴化的共區中學教育	岳 威	1.20
18	靜靜的嫩溪	黃思騁	50	55	從軍夢（[illegible]	華自强	80	92	赤色恐怖下的廣西	黎升俊	60
19	華北革命大學的一角	謝 方	30	56	中共[illegible]	章 桐	1.00	93	蘇俄搗亂中的聯合國	葉時中	40
20	人民英雄（連環圖文）	張 黄	80	57	土地[illegible]	馮 龖	50	94	反攻大陸與游擊戰	高祖武	1.20
21	解放區的悲劇	馬 可	30	58	中共[illegible]	孫小蘭	70	95	中共鐵蹄下的僑眷與歸僑	陳乃超	70
22	鐵幕冤魂	陳逸鵬	35	59	中共[illegible]	[illegible]宇	70	96	[illegible]馬克思哲學到廿世紀哲學	徐 濬	1.00
23	中國鐵路及其發展的趨向	邱光甫	1.00	60	西子[illegible]	[illegible]更生	40	97	英國社會主義與勞工黨	何 聲	1.20
24	叛徒	洪 毅	30	61	[illegible]	周作傑	60	98	共區農村教育	許平德	1.20
25	紅色的上海	陳大明	50	62	中國大陸[illegible]	林式玉	80	99	小鬼隊下冊（連環圖文）	華樹基	60
26	毛姑復仇（連環圖文）	司馬長風	50	63	今日北平[illegible]	陳寒波	1.20	100	靠攏份子的違心論	劉昌臨	1.10
27	陷阱	蔓 羅	30	64	史太林的統治[illegible]	易重光	1.20	101	魔窟見聞錄	梁朝盛	70
28	清算毛澤東思想	鍾國仁	30	65	亮齋雜錄	徐亮之	1.20	102	印度政黨	周祥光	70
29	華萊士與共產黨	易重光	30	66	前進女兒傳（[illegible]	張 誠	80	103	地租與地權	金一鴻	1.80
30	黑夜裏的太陽上集（連環圖文）	韓劍琴	60	67	我認[illegible]了共[illegible]	董時進	1.00	104	日本帝國面面觀下冊	李滿康	2.30
31	黑夜裏的太陽下集（連環圖文）	韓劍琴	50	68	民主[illegible]	常 仁	1.20	105	蒙古簡史新編	孫福坤	1.90
32	馬克思政治哲學批判	胡 越	50	69	論共[illegible]	董時進	1.20	106	地下火	陳寒波	1.90
33	中共土改與中國土地問題	金一鴻	1.20	70	參軍記	李 誠	50	107	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	陳寒波	2.00
34	新蠻人之出現	張葆恩	40	71	共軍內[illegible]	程 拭	1.00	108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左舜生	1.20
35	赤色間諜	周共波	50	72	中[illegible]	沈尙文	1.00	109	空門劫（連環圖文）	花其仁	80
36	共產黨和平運動眞相	高 原	30	73	中共[illegible]	張季高	1.00	110	陳寒波之死	張公道	1.00
37	蘇州河的哀怨（連環圖文）	蔓 羅	60	74	新沙皇[illegible]	香 苑	1.00	111	日本的土地改革	徐義宗	80

總經售處：福利書店　香港德輔道西二六九[illegible]　[illegible]平安書店　九龍彌敦道六七六號